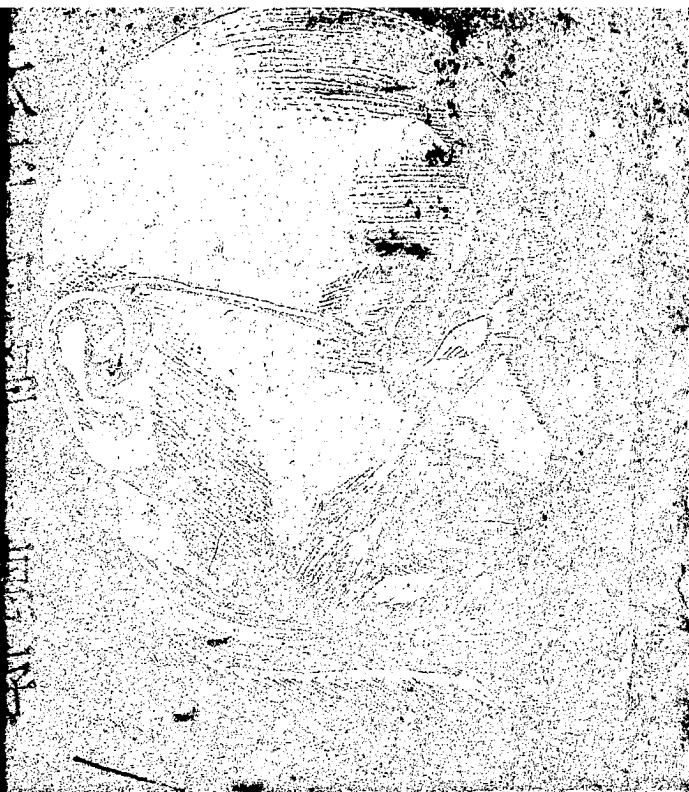


印度十大民族領袖



INDIAN LEADERS
of TODAY

李俊清 李曉 孫起孟 合譯

印度十大民族領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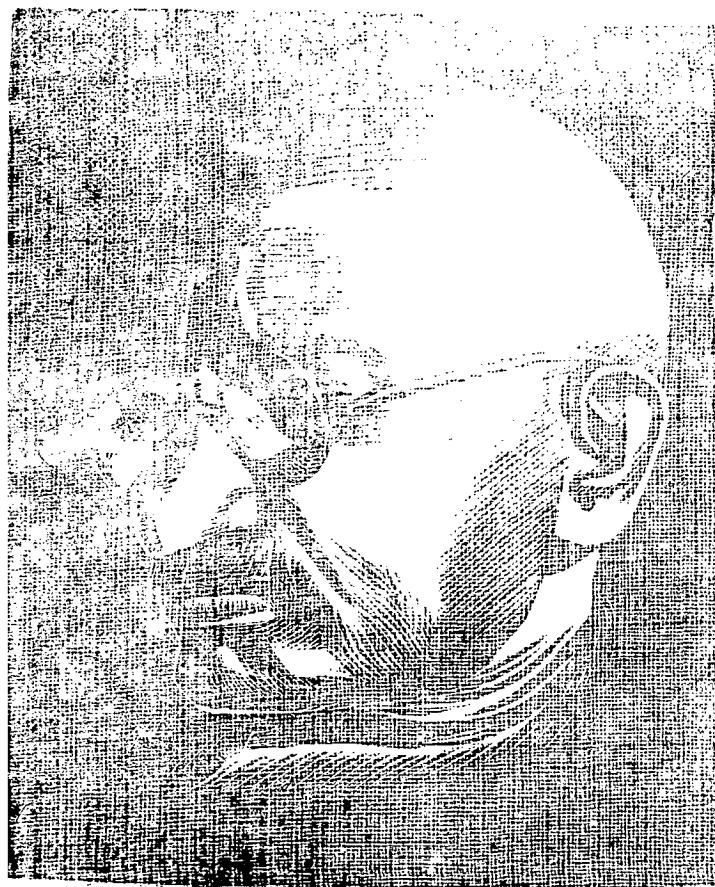
進修出版教育社發行

目次

一	甘地	三
二	尼赫魯	一七
三	阿沙德	二五
四	真納	三三
五	奈都夫人	四一
六	拉琪哥帕拉却利	五一
七	阿加克汗	六一
八	安伯德加	七三
九	薩泊魯	八一
十	莫拉維亞	八九



瑪哈特瑪·莫罕達斯·迦蘭尚德·甘地 (1869)



瑪哈特瑪·莫罕達斯·迦蘭尚德·甘地

(Mahatma 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假使印度人民不分階級、信仰及政黨的高朋、舉行一次總投票，選舉他們的人民領袖、國家的代表或最可敬愛的民族英雄，無疑的這位瑪哈特瑪甘地一定當選。不傳他那些長期的為國從政清淨無私的英勇事蹟，在同胞的心目中爲他造成了神聖的地位。他的一生，可以說完全供奉給於無私爲國熱誠。由於他堅強的自制力，持得的果決，清對政治、社會、經濟各項人生問題的堅韌和謙恭服膺的高尚道德與精神，加上了他的「求真」、「非暴力」的主義，「這些以及好幾因素，使他獲得「瑪哈特瑪」(「第三佛陀」、「廿世紀的基督」、「和平使者」)、「印度教皇」、「甘地」等美號。不特此也，他更成爲千萬國人所崇拜的偶像，他們敬他爲政治的甚至社會的救主。在國際間他也有着不少的朋友，敬仰者與篤信者，這些人總會發現了他是如何有犧牲犧牲及終身服務的精神的。雖然有時也覺得他的政策帶有少許古怪，他的言論中常常免不了有難解的成分。

莫罕達斯·迦蘭尚德·甘地於一八六九年十月二日生於波旁地(Porbandar)——印度西岸古

者拉特 (Gurab) 中的一個小海港。這是小小藩邦中的一部份地區，那裏，他父親曾一度任內閣總理或「地旺」(Dewan) 的職務。他的家庭屬於印度商人階級。族中曾出過幾位知名之士，他們以服務公衆的熱誠與勇氣著名。莫罕達斯的父親受過很少且不規則的教育，然而他有豐富的經驗，堅強的個性與高倫的節操，他的母親又是一個滿懷虔誠的信仰與熱心宗教的女人。在如此非凡的父母的教養下，無疑的莫罕達斯會被培養成一個高倫的品格與具有超人的遠見。

甘地的幼年教育一半是在波旁地受的，後來又到這一藩邦的京城喇其古特 (Rajkot) 進入小學，學校生活所給他的印象甚淺。他是一個畏葸的，敏感的孩子，有着頗高的讀書能力，素來厭惡任何運動或遊戲。他的神經過敏的性質使他避開了校內外任何交際。在學生生活中，最卓著的事情是他從不說一句謊話。

因了當時階級習俗的束縛，甘地不得不在十三歲時即與訂婚六年的迦絲都利貝 (Kasturba) 女士結了婚。她與他的年齡幾相等。對於這樣一個畏怯、沈默而從未享受過團體生活之樂趣的孩子，有一個敬仰他，永不與他開玩笑（開玩笑是他做學生時最拍的事情）的女孩子來作伴，當然會受到他的歡迎。可是當時他不大瞭解這是終身伴侶的開始，此後他們共同經過許多艱苦、努力，相愛相敬的心情日加加深了。

甘地於一八八七年在亞麥達巴得 (Ahmedabad) 入大學，那時有人提議說他應該去英國學習法律。這時他父親已去世兩年，假使他仍然在世，一定會堅決反對這個意思，因為他自己是在印度教老武正統派的教養中生長教養，而印度的教條又非常頑固。當時的人們也都以為橫過大洋是一件極危險的事情——這種危險甚至不下於如有甘地家族那樣高的階級地位，忽而一旦被取消了一樣。所以，雖是沒有父親的反對了，却遭到教會中長老們的嚴重抗議，甚至有的還去警告他的母親，誇張去英格蘭時所要遭受到的種種危險。然而甘地早年即有一種研究的的天性，對日常生活以外的事物莫不發生極大的興趣，緊抓住見識世界，增加知識這一個機會。是以能用機敏的口才，莊嚴的誓言不犯戒肉食，戒飲酒的規條，取得了母親及許多長老們的允許，這樣，他終於消除了就讀的一切障礙。臨行前，老年的母親彌含了熱淚說着祝詞同她的兒子道別——這也是最後一次的祝詞了，因為甘地尚未回國的時期內她即已長眠不下了。

由一個與他家庭有關的慷慨的朋友的幫助，甘地得到路費，粗粗的購置了一些必需用品，即東裝啓程了。由孟買 (Bombay) 出發，平安的渡過了整個海程，只不過是環境上初次有這樣的改變，使他難免起了思鄉之念。可喜的是在同一艙室內遇到一個舊友。但是除此之外，在這次海行中，他極少同人結交。雖然他並不靠船，但是他的大部分時間完全停留在艙室中，很少與同船人來往，避免和人結識的機遇。

經過桑波頓 (Southampton) 繼續前進，不久即到達倫敦。由一個印度友人的協助，他搬進斯吐耳街 (Store Street) 一個寡婦的房子內居住。他在母親前吃素誓言，他的寡母的憤懣，使他不去尋求朋友，他的渴念遠離東洋的家鄉，母親，妻子和兒子，——所有這一切使他在英國的生活有一個時期非常的愁悶而難受。然而也有使他快樂的事情，比如：他到倫敦不久也開始練習跳舞，學讀法文與參加辯論——這些在後日使他感到的不淨權是金錢與時間上的浪費而已。至少在他自己看起來是如此。在這一時期中，他也喜歡音樂，當遇到百思不解的難題時，也去玩弄一回 Gipsy，使他的疲倦了的腦力得以休息而重新恢復。那些聖歌使他的思想由印度多神教中得到解脫。他也讀聖經，其中的某些部分——特別是「登山寶訓」(The Sermon on the Mount) 深深的影響了他的內心，這些聖書再加上可蘭經，從此成為他的永久伴侶，給了他不小的解決人生各種問題的能力，且指示他在他的職業上應走的道路。他堅信無論在任何環境中，任何難題，這些聖書皆可能幫助我們去解答。很明顯的，他的理想和原則，盡心職守的精神，不畏犧牲的追求真理，絕對的非暴力的思想以及其他言論或者行為上在顯露出那些宗教書籍所給他的影響。

當他在英國時，有一件比較重大的事情，便是他曾於一八九〇年去巴黎參觀偉大的博覽會。在法國京城見聞使他感到驚奇，尤其是那莊嚴偉大的法國天主教堂，世界知名的聖母院 (Notre

Matho)。在法不為即同倫義繼續勸讀，一八九一年六月考式及格後被高等法院錄用，同年六月十二號得到律師的地位，即啟程返國了。回國後第一件使他傷心的是在登陸時所接到的他母親的死訊。

回國不久，即去當僑偉大的孟買城中委任律師，懷有極大的抱負，得到很高的聲譽，為該中老幼及朋友們所敬仰。但是在第二次出庭時却並未成功，對作一個成功的律師一事，完全絕望了。加以孟買生活之昂貴也非他所宜居留，乃重返故鄉喇其古特。在一個短促的時期他曾週旋於第二次職業的決定，然而不久即來了一個很好的機會——為他消除了不少的煩惱。波旁地一個富裕的商會提議委託甘地為他們在南非的法定代理人去料理他們在那法院裏的一宗案子，果然就這樣決定了。於是二八九三年四月他由孟買出發去德爾班（Durban）履新了。

在南非的生活是他公共事業的開始，這裏他為他後來得名，受全球景仰的驚人事業打開了一條大道，到南非不久，他即深深感到印度在國際間地位的低下，非常痛心，常說：「我覺得因為我是一個印度人，所以我並沒有權利；更準確的說，我覺得我沒有權利做一個人，因為我是一個印度人。」在那裏，對於有「人種歧視的偏見極可憎厭的流行着，只因爲他與他的同胞是印度人，所使他們不能與別人一樣的享受「人」所應有的權利。他和他的同胞經常忍受着被人輕視。爲

了還假，他抵抗那種惡力與不公的英勇方法，就是在他未獲得偉大成功的步驟，足以昭告全世界之前，這位英雄的愛國心、自尊心、果敢的意志與不屈不撓的精神。在外表上表現的是羞澀、沉默，在公共生活之中也並不活躍的保守份子。甚至到今天，他也還是如此。在南非他幾乎住了二十年之久，正當他極力為國人權力的恢復，從事艱苦鬥爭之際，足以顯示他個人特殊性格的優異。是在一八九九年發生的南非（荷蘭種）移民戰爭（Boer War）中，他第一個應徵為英帝國服役，他組織一個戰地救護隊，有不少偉大的成績。同樣在一九〇六年組織暴動（Zulu Revolt）中也組織了一個担架救護隊，一直服務到這事件終了。他這些卓著的成績已為政府所賞識，且贈以皇家金質獎章，從此他的大名即被存記在政府的檔案中了。

他的妻子以及全家當他在南非的大部分時間中皆與他同住。他在菲尼克斯公園（Phoenix Park）組成了一個小小的僑民團體，其中的分子們皆如兄弟一般地工作着。他那許多國內外的朋友們和他一起生活，並且設法幫助他完成這個計劃。他的妻子在實際上和精神上也都給他不少的幫助，甘地非常感激她。那時他的聲名蒸蒸日上，國內知名之士莫不咸願引他為同志，為朋友。此後人人公認他的勇於服務不惜犧牲的精神。祇要打算一下，他早已發財了，可是為着崇高的理想，他倒反樂意犧牲他的生命。

由南非回印度後，他到會經一度計劃執行律務的地方——孟買，此次與前次大不相同了。可是居住不久他又被派回南非：這是因為齊民部大臣約瑟夫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抵達南非，該地印度僑民團體爲着要向他請願，急需他的指導。甘地回到德爾拜後即草擬呈文向約瑟夫張伯倫建議各種計劃，然而對於張伯倫的熱望終成泡影，南非印人的任何虧空未得中雪，結果大家異常失望。於是甘地又祇有在白種殖民者手下遭到絕大的痛苦與侮辱，然而他却並不因這些個人的羞辱以及團體的痛苦而灰心，他更堅決的更積極的爲他的同胞們爭取權利而奮鬥。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歐戰爆發，甘地匆匆去英，在倫敦組織了一個戰地救護志願隊，包括所有該處的印僑，以學生爲最多。他對於這種工作在波爾戰爭中已得到相當豐富的經驗，因之此次的成績當然會得到政府的讚賞。但不久他即停止了這種工作。他的過度的工作，他的自尋的苦惱——如絕食，（那是形成他的非暴力主義的一部分，以後他常以此與社會的政治的錯誤作鬥爭。）任何食物藥物方式的肉食的戒絕等都是有害於他的健康的，因而長時間的纏綿於嚴重的胸膜炎症。他雖然十分熱衷於倫敦的工作，身體的多病終於使他不得不採納友人們的忠告，回國休養。在歸程中他的病體引起各方的關心與焦慮，當他抵達孟買，知者莫不額手稱慶。他受到當時印度政治領袖戈白爾、喀利師納、葛克哈爾（Gopal Krishna Gokhale）的歡迎——這位老先生是爲甘

地等印度今日的領袖們所最推崇的。

返印以後，健康雖然未見進步，爲着響應一九一八年吉羅姆斯福特爵士(Lord Chesham)在德里所召集作戰會議上的號召，他還是免力在蓋達(Kheda)發動一隊人應徵入伍。等到他的努力獲得成果，戰事兵補充的需要却已消失了。

葛克哈爾會組成「印度社會服務處」(The Servants of India Society)甘地一度參加，並擬以殘生之力盡付於此種工作之上。但不久他又發現其中有許多理想與他相異，是以總難合作。可是得着葛克哈爾的幫助，他在南麥瑟巴特附近的山薩提(Sabarmat)發起了「啊什拉木」(Ashram)——一個精神生活改進社，與他在南非非尼克斯所組織的僑民團性質相近。其中所有的會員——如英人安得魯斯牧師(Rev. G. F. Andrews)或其他高等的外國人及印度人——皆過着簡樸自立的，勤儉的生活。他們自己辦理廚下的事情，整理花園，洗滌什物，還掃庭舍以及其他日常瑣事悉歸自理，而且他們更對口服從紀律。

葛克哈爾的死對甘地是個重大的打擊。甘地不懂，佩這位政治上的老前輩，而且推崇他爲聰明的，有經驗的，穩當的，「印度公共生活的急風濟中一個平安的駕駛手。」甘地曾以一年的工夫遊歷全部印度，所有的重鎮皆有他的足跡，盡力調查各地的民情。

歐戰結束時，他還是十個英國政權的支持者，忠心於英國皇室。但勞萊提法第 4 條 (Section 4) 使他開始了激烈的不合作政策與和平不服從主義。這與他自稱的「真理」及「不抵抗主義」爲他的武器。他說：「我的第三個打擊來自勞萊提法第 4 條，這使我們自由的法令，我在那時即開始領導業民對政府。應之而至的是勞適普和穆泰齊克即前之甘地即前之開辦進進吠囉 (Gandhi's) 大屠殺開始。慢慢的向大衆推廣。

甘地政治生活的歷史也就是 1915 年以後十年來印度政治演化的歷史。本文專對於他的活動的效果不擬論及。並非十個無道義的叛徒，也並非一個使人不滿意的革命家，他確實是該位極有力的煽動者。他的許多與他認爲在政治、宗教、社會、道德各方面都具非正道、罪行的暴力鬥爭的顛倒的宣傳。他在那生動而美麗的自傳「我在真理的尋求中的經歷」(My Experiences in the Search of Truth) 中，他的演說、議論、信札等都包含在這數卷之中。道詞刻毒，他總是每日在古帕申抽服來阿答不下三次，對信以解釋及辯護他對於當前的社會問題的觀點，言論及態度。

對印度做和平使者的外號非常瘦弱，非暴力主義與真理的追求在他的體魄上有了前和各種罪行如

貧困、無知、疾病、奴役等鬥爭過程中所經過的痛苦創痕。寫着表示他自己與「赫律仁」(Herbert) (上帝的選民，他是這樣稱呼着印度教徒中的賤民的) 和印度的貧農大眾身分之合一，他穿着這一班人的簡單而樸素——備備到膝的短褲 (Dhoti) 有時也有一條披肩遮蓋上體。甚至當他在一九三一年充任印度國會唯一的代表去英國參加那專為討論印度問題的圓桌會議的時候，或在珀京翰宮 (Purichan Palace) 中看見英王喬治五世 (George V) 時也穿着他這種印度民族服裝。

甘地的年齡已超過七十歲，聖經上所限制的年齡。然而他仍是很健康。按照他的年歲說，他仍有很大的精力，無休停的討論公共問題。如今他形式上並不在國民大會裏邊，只是站在外面指揮它的行政方針罷了。這也是他的高尚的人格與雄厚的能力表現。他的大部份時間雖然完全消費於通訊、會客與政治問題的討論中，祇要有一刻那間的休息，他便會怡然自得。他最喜歡兒童，他有饒敏的幽默感，也有隨機應變的睿智。他最喜歡去電影院，所以當一九三一年他在倫敦參加圓桌會議的時候，朋友們準備在甘地與那時候恰好在倫敦的卓別麟 (Charlie Chaplin) 會見，先對甘地說明，甘地問道：「卓別麟是何等樣人？」這一次一方是印度政治泰斗，另一方是銀幕上大名鼎鼎的會晤果然舉行了，這兩個偉大的人物會見之後，高高興興有說有笑，品茶談天，過了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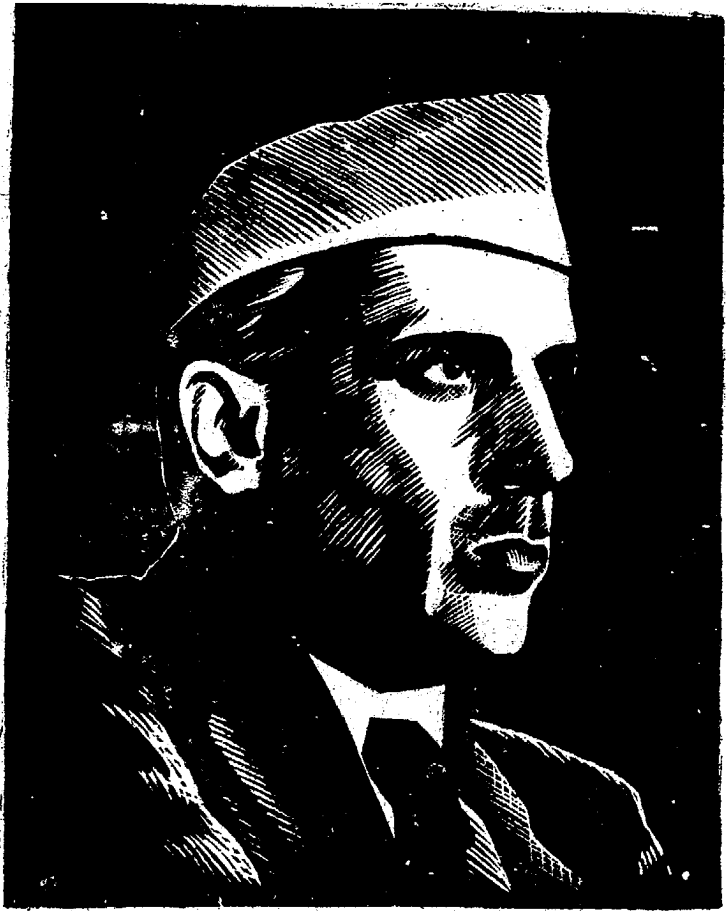
小時方與薩分手。

「註一」「瑪哈特瑪」字面上是偉大的靈魂的意思，這是對甘地的一種尊稱。

「註二」Gita：一種樂器名。

「註三」波爾(Boer)：爲南非洲之荷蘭種族之移民。

「註四」祖魯(Zulu)：一種民族，南非洲一種好戰的土人。



般地特·扎瓦哈萊爾·尼赫魯 (1883)



(8 8 2 1) 魯 赫 瓦 · 爾 萊 舒 瓦 丹 · 赫 此 維

般地特。扎瓦哈來爾。尼赫魯

(Pundit Jawaharlal Nehru)

是一個偉大父親的大兒子，享受了貴族生活中的一切。福，有過接受西方教育的機緣，在今天印度民族領袖中的地位正各方面都是得凸出的。他的思想與行爲的獨立，言談的流暢，作事的勇敢，服役祖國的不畏犧牲，爲公服務，赤誠的國心，從不輕易的出心，對國內農工生產份子的同情與光輝磊落的精神，在今日印度的諸領袖中，很少有人能超過他。他那至高的才力，與不屈不撓的性情，使他永遠在愛國活動的第一線上，當在今日其他領袖初開始政治活動的年齡上，他即已爲久經磨練的第一等大領袖了。四十二歲時（一九一九）在拉哈爾(Lahore)城他首次被選爲印度國民大會主席。他的父親般地特。普提亞爾(Pundit Motilal Nehru)是前任主席。這很早的年齡即當此重任，在其他領袖中殊爲罕見。全國人士給他這種罕有的尊榮，表示全民族信賴他的安定的領袖天才。他能爲國民造福，領導全國渡過任何艱關。的確，他爲印度爭取自由的熱心，爲了達成此目的而犧牲一切的精神，博得了國內男女老幼無限的敬愛。他的廣遠的才力與高尚的品格，足以爲他在國際上亦博得莫大的聲譽。

尼赫魯父子都屬於印度西北部喀什米爾族羅門教 (Kashmiri Brahmins)。這些人在十八世紀早年當回教徒進襲喀什米爾的時候，就一下由在這塊富裕的平原上尋求幸福。「扎瓦哈爾爾的父親般地特·莫提萊爾·尼赫魯是阿拉哈巴特高等法院 (High Court of Allahabad) 一位有名的律師。扎瓦哈爾爾是他的獨生子，生於一八八九年十一月十四號，莫提萊爾在他的一族中是第一個人探行西洋生活習慣以及雇用西洋護士照管他的兒子，扎瓦哈爾爾的早年教育是在家內由英國英人布魯克斯 (F. T. Brooks) 教導，這位布魯克斯是由英國來印度參加安姆烏桑夫人所發起的通神運動 (Theosophy Movement of Mrs. Annie Besant) 的。一九〇五年莫提萊爾與他的兩個孩子們——扎瓦哈爾爾在這時已有一個小妹妹——去到英國，逗留不久即回印度，但扎瓦哈爾爾却留在那裏進入著名的哈洛公校 (Public School of Harrow) 讀書，當時哈洛的同學有甘波沙拉迪迦薩希伯 (Tika Sahib of Kapurthala)、拉亞日埃屋夫 (Raja Jai Singh)、巴魯達的蓋克瓦吉 (Gaekwad of Baroda) 之子，奧迦斯沙穆罕默德蘇萊曼博士 (Dr. Justice Shah Muhammad Sulaiman)。在哈洛二年以後，於一九〇七年十月他進入劍橋大學神學院，一九一〇年參加該校之科學名譽畢業試驗，得到第二等榮譽。他參加考試的科目是化學地質學與植物學，考完以後，就離開了劍橋。可是無論在校內或出校後他的興趣却並不十分接近這些科目。留居英國時，他

曾在英倫三島和歐洲大陸上遊歷許多地方，交結了不少有名朋友。離開劍橋以後，開始選擇職業。考慮很久，最後決定參加倫敦法院。一九一二年夏季獲得律師資格。同年回國——在英倫共住了七年。一九二三年當他因一篇公開演說中主張剝奪外國商賈特許權案給以幫助而受嚴厲的感觸，便去當與法庭。這極的說。

二十年前我曾在英國住過了很長的時期。在那裏受過出等以至大學教育。深深受到劍橋與劍橋的成見的影響，在好幾一方面看起來，我簡直是個英國人。我的世界觀完全是以英國人的觀點出發，當我初回印度時，我恐怕是對於英國人個個最多的印度人。

他回國後，首先在父親指導之下在阿拉哈吧特充當律師。這一種固然對於孔瓦萊爾尼赫得的事業有很大的幫助。可是同時也舉了個大障礙。有時很優的工作機會來臨，他完全被父親的阻礙遮擋了。然而假使他肯繼續這個律師職業的話，那末後且在這一方面的成就也不會下於他的父親。但過了七年的律師生活之後，終於在一九二〇年停止了。換了另外的方式。種種種種為祖國服務。加入政界的前後，孔瓦萊爾愛好健康，活潑，生氣勃勃的生活。最喜歡騎馬，游泳，爬山以及冬日的各種運動。

一九一九年是近代印度歷史上最可紀念的一年。被編就通過了甘地所為統治者看入官字之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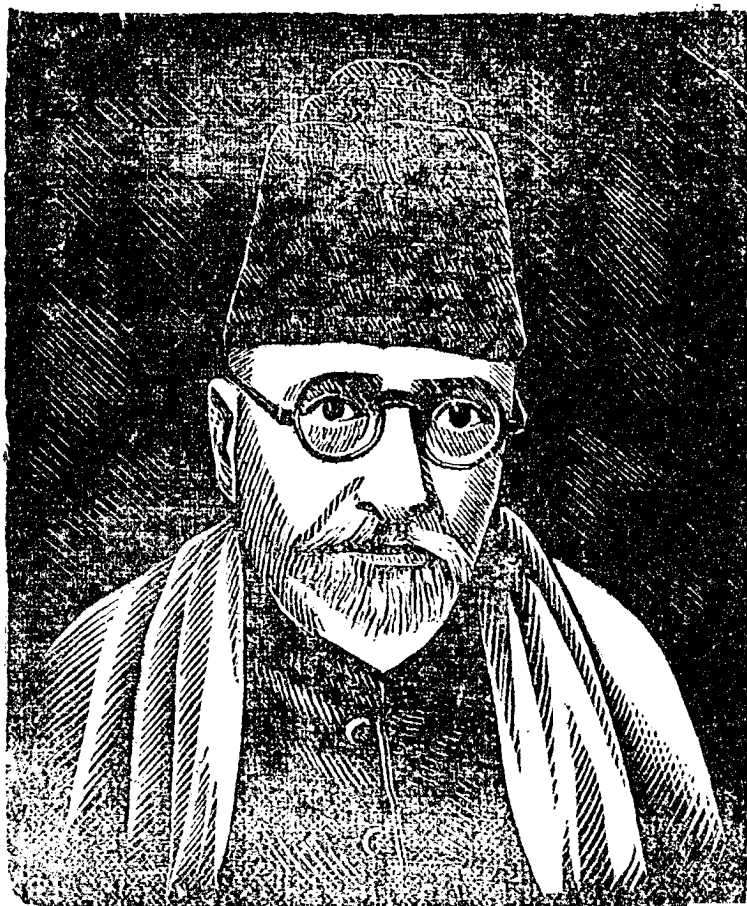
尋的勞案特法令，那爾甘即已發起了他的脫離格拉哈運動 (Satyagrah Movement) (非暴力主義與不合作運動) 喚起人民的熱情，堅決不合作以食肉酒精的手段。孔瓦察爾感應了這神聖召令停止了律師工作參加了這個運動。他和非暴力運動的密切關係使他很早發覺到其極偉大以充分表現他的藝術天才與組織的能力。不久之後，這種極端能力招致國內的野獸人的認識。他既以身許國就使置著許多種種為他的個人爭取自由。什麼困苦刑罰苦痛動不了他的堅決的意志——禁食等士獄、言語的不自由、出版的未自由以及非他接受二種三的強制的手段，決不能使他腐蝕長銷且消且種他奮外鼓動勇氣，發揮了從他的先哲者甘地那裏抽取精華的非暴力的精神。

廿四三年他的故鄉選為自治會主席。版新此職署凡三年，博得政府及人民對他的能力的欽佩。他的工作的熱衷則有政府率軍進至他的政治上的敵犬，亦賦勇加以讚佩。他那對人對白坦率指點，始終無惡的評價，心為人家所嘉許。另外一件偉大的工作是在聯合省裏從事「茶山」(Tea) 及農民運動。這道更可以說他包作領袖的能力及反對國際大眾的同憤心。這個運動之根柢有力完全由於他一人不懈的努力及農民們對他的信仰所造成。

會黨依隨國民去位的孔瓦察爾五哈察爾被選為出席國際反帝國主義的代表。這是他第三次參加布魯

塞爾 (Brisola) 開會，在裏邊佔了一個極爲人見重的地位，他是布魯塞爾會議主席團中的一員，也是在第一大會表開演說的一位，會經作了那秋季會議評議會的主席，在這同盟的常會裏，他是五位主席之一。——除此以外，是愛因斯坦，羅勃曼，孫中山夫人與喬治蘭絲伯利 (George Lansbury)。他被選爲反帝國主義聯盟大會內的常務委員，這次布魯塞爾大會的主要目的，如尼赫魯回國後對國民大會的報告中所說的，是促進國際間民族解放運動的合作及各國勞工運動的聯繫。

在十九三六年四月扎瓦哈爾發表了他的光輝的自傳，這裏面說明近三十年來印度政治發展以及他個人的生活史，這是近代很成功的著述之一。第一版在倫敦印行，未滿一年已經出到第八版，可見其銷路之廣。——後來印度銷行亦廣。版復一版地印行著。扎瓦哈爾是甘地的忠實而熱心的追隨者——這是本文早已經提到的。甘地是第一得榮望，及爲國民所最敬愛的人。第二人就是扎瓦哈爾。然而在該數種觀點上他並不與那偉大的領袖甘地相敵。比如甘地極端的反對共產主義，而尼赫魯則公開的讚美共產主義的溫和的形式。——甘地雖按照他們的信仰上說，甘地虔誠的崇拜宗教，而尼赫魯則對宗教似乎並不太關心。甚至幾乎偏於無神論者。他不是——個盲目的崇拜者，這又可見他對甘地的崇拜主義不啻費同一陣中。



茂蘭納·阿布爾·迦蘭·阿沙德 (1888)

茂蘭精·阿布爾·迦蘭·阿沙德

茂蘭精·阿布爾·迦蘭·阿沙德，印度國民大會的現任主席。在印度爭取自由中的最堅強而領導的領袖之一。曾數任大會主席。是少年成名的偉見的領袖，雖然年踰於其他諸領袖。恰如他特·扎瓦·萊爾·尼赫魯 (Pundit Jawaharlal Nehru) 在他的自傳中所說：「阿布爾·迦蘭·阿沙德的『少年老成』的外貌，恰恰與他那廣博的學識相稱和。」他的為國服務和犧牲的紀錄，是非常光榮和顯赫的。同時那也是他為國家熱愛，對黨國具有遠見和堅定不退縮精神的確切證明。他是近代回教科學家 (Muslim Scientist) 之一，他的科學與動奮研究，使他無意汲汲成名。他來自私心不計名譽得失，只以護忠職守為樂事，成功的光榮，儘可歸諸別人。就性格來說，他是三種性格，那深遠的科學知識帶給了他真實的營養。他能够超脫了一切宗教上的論辯與社會爭執的爭論。

他在八八年九月中阿沙德生於麥加 (Mecca)。父親茂蘭精·穆罕默德·凱得汀 (Mahmud Mahomad, Khairuddin)，是一個大思想家與回教科學者，家族中幾代皆有聲名顯赫的學者與

神學家，父系母系雙方都有不少以宗教教師及編編虔敬或聖潔稱著的祖先，少年阿沙德深受這種傳統的影響，且在密佈着宗教氣氛的環境中長大，所以他很早即被灌入了強烈的宗教思想，雖然他並未染有太偏於隱士的習俗，但養成了沉思與集思的習慣——一個真理的忠實的追尋者的必備條件，埋首於深遠而神秘的宗教學形而上學之中。

他在亞拉伯 (Arabia) 度過他的童年，在父親指導之下受到他早年的教育，後來在開羅 (Cairo) 繼續進入世界聞名的阿爾阿沙大學 (Al Azhar University)，研究神學，他是一個早慧的孩子，十四歲以前，即熟識了回教神學與普通宗教的學識——這些那些老神學博士們不勝驚奇的，因為他們自己悲觀，俾簡直被認為神童，他的急智及無邊的求知慾，立刻顯示出這是一個前途無限的青年。他雖然是在於處於一個正統的宗教環境中，但他永不是一个個舊例成規之無理性的被動的盲從者。他不但是一個探究的學者，而且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正因此故，在他與那個僅為宗教的盲從者，那些因了不肯用心充分了解宗教本身的不斷犯着最大錯誤的人們中間劃出一條分界線。他的關於伊斯蘭 (Islam) 教義的博識，他的胸襟的寬闊以及他內心的修養，使他成為「和平兼愛宣言」(Message of Peace and Love) 一個最好的解釋者，這一層，一如其他任何宗教，是伊斯蘭教的中心教義。

到印度之後，他寄居於加爾各答（Calcutta），從一九一七年起即開始了政治工作。甚至在這以前他已得到了國內外朝野人士們的注意——這主要是在回教神學研究者羣中，對伊斯蘭宗教文壇偉大的貢獻上。他的不存成見，他的創造能力以及他的獨立的觀點，爲他掙得了在回教世界中的廣大的敬佩；在加着他創辦一份有名的烏爾都文的印度週刊（*Al-Hidayat*）專討論或解釋那些在土耳其或別的回教國家常有的問題，以啓迪當時的回教大眾。但不久這種刊物即遭政府的反對而停刊了，接着他創辦了第二份刊物，稱爲 *Al-Balagh*，但觀點的獨立又爲他帶來了被禁止發行的命令，和奧瑪蘭格，穆罕默德·愛德（*Maulana Muhammad Ali*）沙密特·愛德（*Shariat Ali*）——爲第九節——盧禁的處罰，這在第一次歐戰（一九一四年）之前，他的言論對於印度回教社會影響甚大，即使當時的回教聯盟也常常不受這種思想變動的影響。

一九二二年阿沙德與甘地相識，參加了在後者領導之下的國民大會，他在國民運動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爲甘地之非暴力主義的存身而擁護者，他是吉拉發特運動（*Khilafat Movement*）領袖之一。爲了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年之不合作運動使他與穆德（*C. R. Mudaliar*）及穆德兄弟同時入獄。此後在國民大會黨務委員會中他成爲一個忠實的民族主義者的回教徒。一九三二——一九三五二年爲和平不服從運動中要人之一，曾幾次下獄。一九四〇被選爲國民大會主席，盡力於其職務中，經

阿沙德曾參加由回教聘學博士們組成的擁有廣大群眾的宗教團體 (Sadr-ul-Millah Movement) 期間，曾爲印度回教制訂了法典。有些固執的團體狹窄的人民，不贊同這些神學家進取的政治觀點。但阿沙德對這團體以及國民大會的忠誠並未因此而波動。他始終個誠實的回教徒，忠心的民族主義者，曾盡最大努力倡導回教未來的光榮偉大與印度獨立之達成的不可分性。學說說他是印回團結的使者，努力促成印度國民大會與回教徒聯盟的密切合作，使他們以同一手段而同一目標前進著。他堅定的認爲回教徒的利益與印度全國的利益是不可分的，並非不相容的。儘管一部分的印度回教徒，從事分裂印度的煽動及要求，阿沙德則雖滯在一個自由團結的印度國家裏，一個民族壓服另一個民族的問題絕對不會發生。

他是一個沉着而眼光遠大的政治家，一個學問廣博的作者，一個正統而獨立不羈的宗教思想家。他有不變的作品，題材範圍甚廣，可歸入他的最重要的著作要算真蘭經 (Quran) 的釋義與翻譯了。這對於伊斯蘭文學人有極大的實際價值。在這作品中，同樣包含其他作品所不能表達出他的語言的銳利而悲憤的情緒，以及簡潔而有力的表現。這在後種劇烈的或辯論的作家中是

不易見到的。

同時，阿沙德在家庭間，親友間也是一個非常可愛的人物。雖然態度上似乎是隱秘、嚴肅，然而內心却是和善、仁慈的，和他最接近的人，從沒有看見他發過火。任何事物皆難能擾亂了他那寧靜而沉着的心情。他是誠懇的，然而並非陰沉；學問深廣，並非迂腐；自尊的，並非驕傲。內心中含著謙遜的心情與真誠的培養。他那有禮的態度及懇摯的表情向爲大家所嘉許。他有無限的忍耐心及運用智力的才能。在百忙中，他往往抽暇爲別人解釋在宗教上的難題與疑問。他的習慣及日常工作都是如鐘錶一般的有規則與準確，這位茂蘭納先生在他的淡泊的生活與高超的思想上是一個堅強的甘地主義的信從者。在他身上——如甘地一樣有着一個聖者，愛國者，政治家的風貌。

他是一個長於言詞的人，能巧妙的控制着爆發的理智，幽默的心靈，他最不欲討論關於他自己的問題，這也許因爲他的自私自小的關係，他無論對人對事都有敏銳的判別的能力；然而他真正的自己却不易被人瞭解。他的偉大，與他的美行換來了千萬國人的敬慕。「去認識他即是愛他，敬他，與摹倣他。」



穆罕默德·愛德·奧納 (1876)

穆罕默德·愛儼·真納

(Mahomed Ali Jinnah)

穆罕默德·愛儼·真納是一位聲譽煥赫的律師，動人的演說家，議會中有力的辯論者，及印度回教聯盟的主席，這個團體在他是被為印度回教教的唯一代表機關和喉舌。在回教領袖中，他也有很高的地位。他生下來便是一個回教徒，長大之後，經過自己的思考，仍願作回教徒。但印度却要求他作印度人，作這塊土地的可貴子孫，如其他的愛國領袖一樣，為祖國財政解脫而奮鬥。

在一八七六年的聖誕節，真納誕生於喀喇蚩(Karachi)城中，他的父母是回教徒中的商人階級，父親雖然是富賈，但並不希望兒子也繼承為商人。所以真納在放蕩愛蕩初等教育之後，於一八九三年，十六歲時即往英國學習法律去了。在英國的時候，他與許多歐洲和印度的聞名之士往來，比如當時倫敦的印度僑民國主席囉囉伯海·奧芬(Dadabhai Naoroji)，一位印度的偉大人物，這真象說在他作領袖的才能和服務犧牲精神的表現上有很大的影響與幫助。一八九六年到回教領袖之後即啓程回國。次年即開始了他法律界的事業。

頭到降嘯豈不久，即墮了滿心熱望去富庶的孟買城中充任律師。照例的在前二三年經過了不少的艱苦奮鬥，終由他的忍耐，自信心與確有的才能，使他在職業階梯上慢慢上升，直到最後，居然一躍而為孟買城內律師領袖之一。他從事職業的成績，雖斷的能力使印度最好的律師也常常引他為榮，而他的智慧，說理的清晰，分析的精細，更是無人能及。

他在政治思想上深深受到瓊崖伯海（這是他在倫敦即已結識的）及戈白爾、克里爾、葛克、格爾的影響（God Krishna Gokhale），這二位領袖，在早年的時候，為認識了他的政治生活的光明前途。他們深深讚佩真純的愛國熱誠，果敢與超脫，服務精神和組織能力。一九〇六年真納參加印度國民大會，在那時即提出要求印度自治的意見。一九一〇年孟買管區中之國教徒選舉真納為代表參加最高立法會議，在那裏他支持不少為全國爭取自由的案件。一九一三年又去英國，在倫敦建立印度倫民會社（London Indian Association）熱心的工作者，為國籍學生設法除去很多的困難。回國不久，在一九一四年五月再赴印度參加國民大會代表的資格。其莫爾南談關於英語改善印度立法會議的問題，由這件事情看起來，無疑的證明了國家對他的信任，在他個人則以在英國國會與人羣前而申敘印度情況之巧妙有力，證明他的確是個適合的代言人。他的意見引起英國人士的注意，當時英國之權威報如泰晤士報（The Times）都披載他的談詞並加以評論。

佛與印度回教徒聯盟 (All India Muslim League) 很早即發生了關係，一九一六年被選爲孟買管區回教徒代表往參加印度總督會議，經過長期的服務，真積在印度中央立法院中達到很高的地位，他是一位真誠的愛國者，同時又是位有力的立法委員，但他的和一個黨派利益的一致，不免限制了他原來可有的自由獨立的政策，結果呢，由於環境的壓力，他時常祇有把他的黨派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他的國家利益放在第二位，不言而喻的，他的政策的變動，和回教徒聯盟領導權的獲得，給了各方以宗派主義，氣量狹小的不好印象。

真納似乎生來就是印度全國的領袖人物，然而不幸，他的偏愛使他僅能領導國內的一部分，對於整個國家，這至少是個悲劇！當他參加回教徒聯盟的時候，他還是一個真實的國民大會的一員，並且那時他仍然不欲爲他個人在某一個社團中持優越的地位而忘却了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他當時滿懷着雄心和熱望，盡力於印度這兩大逐漸發生裂痕的民族間奔走斡旋，從他的地位，能力，以及所施的影響看來，他的確是當時的幾位優秀領袖之一，他們都是印度教徒與回教徒的有力的締結人，這種合作，甚至當前也是十分需要的。真納後來的傾向於回教徒聯盟，爲印度命運的與大相失，設若他仍盡全力，熱情勇氣於促進印度國家獨立之上，則派德南 (Patel) 與甘地，阿沙德與尼赫魯，拉然巴都 (Rajendra Prasad) 拉洪普帕拉却利 (Rajagopalachari) 與

汗 (Gafar Khan) 與海登 (D. H. H.) 以及其領袖有名的人物，仍將引他為尊貴的同志而與他合作。但是當運使他走上了相背的途徑時，他對印度教回教大聯合的企圖與大志漸漸消滅了。他漸漸黏着於回教聯盟以及他的利益上。結果罷工——「德基斯坦」(Deccan)——回教徒從全印分裂出來自成一國——自要公同等於「華里基」(Waris) (全印獨立) 的要求了。

真納和其他回教領袖參加了在英倫舉行之第二次圓桌會議，商討印度將來而立憲問題，派去代表回多數黨派對這結果都不滿意。雖然印度國民大會諸位領袖會與真納在長期的通信中誠心的會談或長時間的商討，然而直至今日，這所謂回教回教的大聯合仍然是一個泡影。真納的要求是以全印回教徒聯盟作為唯一的印度千萬回教徒的代表組織，這是不能被代表全印度各黨派領袖的國民大會公然地承認——國民大會包括所有印度教徒回教徒，西克人與巴派人 (Sikhs and Parsis)，猶太教徒與基督教徒之「國民」(The Depressed Classes) 以及其頗少數民族。

雖然體格瘦弱，氣韻在日常生活習慣上仍然是活潑的，勤奮的。他性喜勤勞的工作。在他，無論對其勤奮的人或懶惰的人，決不是敷衍，決不是敷衍，決不是敷衍。他長得高大而挺直，站在顛簸禁止的表現至其強健歸屬長的可靠。他能夠耐其苦勞，有時近健於各種徵候，使他的同情或驕

視他爲執拗的獨裁者。語言有力，表情的深刻使他能於不管現在過去的情形如何，嘲罵政治敵人一事上獲得勝利。雖然在回教徒中擁有優越的政治權力，兼任了回教聯盟的主席，但是他的個人生活却並不十分正統化。伊斯蘭的思想不能阻止他去學習西洋的生活方式，有些地方被回教者認爲有背於伊斯蘭的教規。他的高遠的見解及獨立的思想使他無法做一個盲目的，無理性的純粹宗教神學的信從者。此外這位卓越的領袖還有一項特點，便是從幼年時起即對於服裝非常注意。他竭力避免俗氣的不整的衣飾，常穿着亮潔而整齊的西式服裝，有不少的描摹他生活奢侈的軼事，據說有一個時期他會有四百付袖扣！

◎對胸懷有大志的青年說起來，真納是一個不壞的榜樣：他不畏困苦的工作着，有堅強的責任心，而且不避犧牲的實行「所信」，有絕對獨立的見解，更有堅定不移的目標。作爲全印回教徒的一個公認的領袖，他的地位自然是顯要的，可是如果他能作成一個人民族領袖，那他將成一個更偉大的人物。



薩魯琴妮。奈都夫人 (1879)

薩魯琴妮·奈都夫人

(Mrs. Sarojini Naidu)

薩魯琴妮·奈都夫人，是印度最高天才婦女之一，她的工作，作爲一個詩人，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領袖，特別在把東方思想介紹給西方國家這一點上，是非常偉大的，也許除掉拉賓都蘭納斯·泰戈爾 (Rabindranath Tagore)，她是這世紀的最偉大的印度詩人，而且她又對全世界解釋印度精神最有力者之一，她是國民大會選愛國領袖之一，她服務於祖國的歷史，和她爲此目標的犧牲精神，與現代任何其他偉大的民族主義者可以媲美。在理想的崇高，審美的能力，對於印度的寶貴傳統和光榮歷史的景仰，以及不惜任何犧牲的熱烈愛國精神這幾點上，她是印度婦女值得敬重的模範。憑着她的非常的成功，她爲全世界證明，婦女們，特別是印度婦女，能够有價值的服務於公衆生活中，一如最能幹的男子一樣。再者，她的生活和工作，顯示了一個事實，婦女們如果給以適當的訓練與機會，能够參與政治、社會、文藝各方面的公共活動，並且成爲男子的有力的同志。

薩魯琴妮是阿普蘭納斯·撒託帕德耶耶博士 (Dr. Ashurnath Chattopadhyaya) 的長女，於一八七九年二月生於德根 (Dacca) 海特拉巴德 (Hyderabad)。她的父親屬於孟加拉脫基 (Chatterjees of Bengal) 的顯貴的古老的世家，後來遷居於尼沙姆 (Nasir)。
他是一個在愛丁堡大學取得科學博士學位的偉大學者和教育家，他曾經遍遊歐洲，回到印度以後，就創辦海特拉巴德的尼沙姆大學，這所學校事實上是現在海特拉巴德亞斯曼尼亞大學 (Osmania University) 的核心部份，他的大部晚年生活，完全獻身於印度的自由教育和開明運動的倡導。薩魯琴妮的母親是一個有知識完美的，而且具有相當富於詩才的女子。

在聰多才的父親影響之下，薩魯琴妮在她的幼年時代接受了很好的訓練。她從雙親那里遺傳下來許多身心上的優點。在她還是三個少女的時期，她感覺自己有一種不可抑制的詩才在萌動着，她在極小的時候就開始寫詩，自然的優美和字畫的神秘，抓住了她幼小的心靈，於是她開始表現她的才能在初期詩的創作上。十二歲的時候她入馬德拉斯大學 (Madras University)。在一八九五年她是十六歲的時候，她到英國去，在那裏一直就留到一八九八年。最初她入倫敦的皇家學院 (King's College)，後來進劍橋的哥敦大學 (Girton College, Cambridge)，在她返印度之前她遊歷了意大利維琪爾 (Viggi) 和丁 (Dante)，彼得拉 (Petrarch)，拉斐爾 (Raphael)

， 摩瓊安吉華 (Mithani, Anico) ， 和畢亞餘多·達文西 (Leonardo do Vinci) 的故鄉。一個有這麼多歷史、文學、藝術組織的國家，這裏一個有着美度的景色，和迷人的氣候的處方，激動了她幼小的心靈和想像力，她對於意大利風物的富麗和莊嚴，留下深刻的印象，使她讀人的靈魂，達到心靈轉移的境界。一八九八年因為健康的衰退，結束了她的研究，回到故里。

她回到印度不久就和哥文達拉朱魯·奈都博士 (Dr. Govindarajulu Naidu) 結婚。奈都是醫藥界的一個名人，可不是一個婆羅門人，而她則屬於喀羅門的貴族階級。依照印度的習俗，越階級的結婚是不許可的。可是薩魯碧妮採取了果敢的行動，徹底表示她獨立的气概，從事社會改良的勇氣，對於落伍的習俗和愚昧的成見之輕蔑。她結婚的生活是愉快的，但這並沒有結束了她的詩人和民族主義者的進程。相反的，她以從不消滅的熱忱貢獻國家和詩的創作，『舊金的門隱』 (The Golden Threshold) 和『時鳥』 (The Bird of Time) 是在英國發行的兩大詩集。引起普遍的良好反應和欣賞。她的詩篇譯成所有印度文字和很多種歐洲文字，想像力的豐富，思想的湛深，熱情的激動，音調的和諧，愛國心的揚溢，是一些卓著的批評家和文學家如拉基·西門士 (Arthur Symonds) 愛德門特哥斯 (Edmund Gosse) 和 W. B. 耶茨 (Yeats) 所公認爲滿的詩篇的幾個特點。在她的寫作中，她獲得驚人的成功，在創造印度的真正精神和靈蘊印

麼地位這一點上。她有圓美的文字技藝和對於音樂的敏感。她的抒情的歌曲，充溢着魅力和純淨，是這種形式中的優美的典型。

薩魯琴妮·奈都夫人是現代最成功的演說家之一。她能操許多種語言，她的演說，一如她的詩篇，她是一個語言的魔師。她的柔和和無可比擬的連綴與表現思想的方法，她的引起聽眾的想像和激動情感的力量使她成爲一個圓滿的藝術家。奔着來自內心深處的和她運用文字的力量，她的無間隙的生動的思緒，和她的吐意的迷人的和諧，她吸引了廣大的有知識的聽眾，不備在這個國家的每個角落。就是在歐美許多學術中心的地方也是如此。她在西方曾作幾度的演講旅行，所到之處，她以印度婦女的真實代表和溝通東方西方和平與友誼的使者身份，受着歡迎和崇敬。她的則謂自己的或別人的詩篇是有一種智慧和動人的經驗，能使那些幸運的聽眾心中，保留了一生不可磨滅的印象。

她對祖國的熱愛，她對印度社會經濟和政治新生的渴望，她對外國的侵略和剝削的不耐，和她對自由的企求使她在愛國的印度男女羣衆心中占了一個重要的地位。瑪哈特瑪·甘地，華拉勃海·溥德爾，札瓦哈爾·尼赫魯，C·拉琪哥帕拉卻利，拉琴德拉·般拉薩德(Rajendra Prasad)和所有別的國民大會領袖對她都非常尊重和敬愛。她多年來擔任國民大會常務委員會的委員，一

九二五年當選爲國民大會的主席。除她之外，有過印度國民大會主席榮譽的，祇有一九一七年的安姆·倍孫特夫人 (Mrs. Annie Besant) 和一九三三年的 J. M. 孫戈塔夫人 (Mrs. Sengupta)。不消說她是特別關心印度婦女的幸福，因爲她確信印度將來的光榮依賴着女子的偉大一如男子一樣。用着鼓勵，教育，發動全印度婦女組織的方法，她曾爲她的姊妹們作了不少重大的事情，而且使她們經常負起責任。她曾經果敢地反對如「淺達」(Parda 註)，早婚一類的社會陋習。她是倡導婦女教育，寡婦再隨和其他婦女幸福的活動不懈的工作者。她以印度婦女代表的資格，被邀參加一九三一年倫敦的圓桌會議。她和瑪哈特瑪·甘地——國民大會的唯一代表般地特·馬丹穆罕·莫拉維亞和其他有名的印度領袖們一同去出席。

她對於印度青年及其問題之非常同情與瞭解和她對領導青年運動和組織的熱忱使她成爲這個國家的一個爲青年所愛戴的領袖。她對於幼小的二代影響是很大的，幾乎可以說有一種磁吸力。許多青年組織確認她爲他們有力的領袖和精神的泉源。她的大同思想的遠見和她對宗教的幻想，小組織的偏見的解脫，使她成爲印度印回兩教統一上最有力最熱情的倡導者。我們簡直可以毫無疑慮地說，在今天印度祇有一個人對印度印回教同樣的崇敬，那就是薩魯琴姆·奈都夫人。她爲建立兩大民族的友善關係和調解糾纏不休的爭論，全心全力獲得很普遍的認識，這構成了統一

的最有力的因素。

像泰戈爾一樣，薩魯琴妮·奈都夫人是東方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由於她廣泛的旅行遍和各國幾個最卓著的學術家的接觸和研究，這種豐富的經驗與淵深的學識，使她自信東方西方各國相互瞭解與合作的必要。每一國必得接受別國的珍貴的東西，大家還必須祛除疑慮成見與妬嫉。依她的看法，思想亂紛的滯通，同志的共感，帝國主義侵略的打倒，會達成將來必然實現四海一家的任務。雖然她生在印度而她也如其他愛國領袖一樣地崇敬着祖國，嚴格說起來，她還是一個世界公民。

還有一點更值得注意的，就是薩魯琴妮·奈都夫人雖然投身於政治與社會的活動，但她並不做一般價廉家庭生活偏愛公共生活的女子，她還是保持着她的女性的特點。儘管長期熱烈的參加各樣的社會活動，薩魯琴妮·奈都是一個保持着女性原有的特點的女子。她是三心理想的妻子，慈愛的母親，和和藹的護士。她沒有一點喪失女性的聖潔和尊榮，她是一個印度歷史中被崇敬的和在印度古典文學里所描寫的女英雄的代表和承繼人。

薩魯琴妮·奈都夫人堅決地反抗老年俱衰的現象，而是抱着所有永遠年青精神的堅強俯仰者。她保持青春的外貌。以堅定的樂觀和旺盛的精力，她開始了她光榮的政治生涯。還有與她同在

的人們，均一致公認薩魯琴羅，奈都夫人即使到了六十三歲還會跟十六歲的女學生一樣的活潑與有勁。她很高傲有益的清談。她在這方面有着專家的技術。她那態度的溫和，舉止的自然，能幫助她獲得在印度以及所遊歷過的文明國家里許多朋友、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學家和哲學家、詩人和學者、大學校長和世界聞名的作家。瑪哈拉佳 (Maharajas) 和瑪哈特瑪 (Mahatmas) 都異常崇敬這個「印度的南丁蓋爾」。她是現代亞洲偉大女性之一，如蔣介石夫人一樣，享受服務祖國的世界聲譽。奈都夫人以祖國及接受印度光輝傳統為榮，印度呢，也是一樣的引這個卓越的女子以及她所造成的尊嚴與榮耀為光榮。

註：「濛濛」是指隔絕男子視線的女子所戴的面罩，這種陋習通行於某些印度教回教地區，象徵着女子應與外界完全隔絕的意思。



拉琪哥柏拉利 (1879)

拉琪哥帕拉却利

(C. Rajagopalachari)

O. 拉琪哥帕拉却利，馬德拉斯的前任總理，在印度的政治圈裏往往被人叫作「C. R.」，是這個國家的公衆生活中的動力，爲時已逾二十年了。愛國的熱情和忍耐犧牲的無窮盡的力量，對於印度獨立運動在瑪哈特瑪·甘地的領導下一定會獲得勝利的確信——正是這些條件給他在國民大會的六個戰鬥領袖中培成尊榮的地位。在南印度，特別在一泰米爾·納特（Tamil Nadu），就是南印度說泰米爾話的地方，他在羣衆中成爲最能幹最有力量的領袖是無可置疑的，他的非印度的同志們稱他爲泰米爾·瑪哈特瑪（Tamil Mahatma）或者南方的甘地。他擔任了多年的國民大會常務委員會的委員，這使他和國民大會最高當局，特別和甘地的聯繫發生重大的意義。據說，在解決困難問題等方法的設計或是重大行動關頭的决定上，甘地信賴拉琪亞琪的智慧和與遠見勝於他自己的判斷或傾向。甘地從C. R. 那裏取得熱力和決斷，C. R. 則從甘地那裏獲得行動的狂熱和挺進的力量。拉琪哥帕拉却利最近在國民大會常務委員會的辭職，在政治圈裏

引起很大的激動。

馬德拉斯省薩勒姆縣 (Salem District) 的一個鄉村叫作霍索 (Hosur)，是拉琪哥帕拉却利的誕生地。於一八七九年，他生於一個以書香門第和族人的正統氣派著稱的薩羅門家庭。他的初等教育是在他本村受的，後來他到班加 (Bangalore) 進入那裏的中央大學。繼而他進了馬德拉斯的省會大學，從馬德拉斯大學取得了文學士的學位。接着他又進馬德拉斯的法學院，取得執行律師職務的資格。他在馬德拉斯的高等法院登記為律師，可是因為個人和家庭的關係，他沒有在當庶人業的省會，而在薩勒姆的地方法院執行職務。他的活動之局限和參加公眾活動的稀少足以說明他的能力和傾向會不可抗拒地向那一方面發展。

就職業方面說，拉琪哥帕拉却利具有所有造成一個成功的律師的條件——剛毅、精明明快和分析的能力。尚不止此，他具有一種少見的堅韌不拔的工作能力，在他擔任馬德拉斯總理的任內受過很大的測驗，養了這種能力，終於獲得驚人的成功，在一九一七年他被選為薩勒姆地方廳的主席，他以卓著的聲譽和行政能力擔任了這個職位直至一九一九年。他的故里的各種重要公事業多由他創辦，在他擔任地方廳主席的任內他直接地或間接地促成了這些設施。

同級地特·札瓦哈來爾·尼赫魯一樣，這一個偉大的愛國者為着犧牲甘地的號召，拋棄了前

這大有希望的律務，參加一九二〇年甘地領導的不服從不合作的運動。從此以後，他就和國民大會參與的印度主要政治運動發生不解之緣。一九二二年他第一次被禁錮（Imprisonment）入獄，此後因為政治罪幾度被處從幾個星期至幾年的徒刑。

他是印度國民大會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的總書記。一度在瑪哈特瑪被捕的時期發行「少年印地亞」，作為國民大會和平不服從委員會的「份子」，拉琪哥帕拉却利和幾個領袖力主保持和立法會講絕交的政策。在一九二六年「加耶會議」上（Gaya Congress），他領導了「不彎節者」（No Obayers）反對 C. R. 達斯（Das）和他主張參加立法會議的伙伴。他領導了一九二〇年與一九三三年的和平不服從運動，每一年都被處徒刑。在關於立法機關與賤民階級的代表問題上，一九三二年「耶拉達達協議書」（Yerawada Pact）的訂定，他是許多力事推動者之一。在這次協議書上，所有全印足以影響印度教徒的領袖都簽上了他們的名字，如般地特、馬丹、穆罕、莫拉維亞、J. B. 薩頂魯、M. R. 傑耶加（Jeyaraj）、B. R. 安伯德加、C. 拉琪哥帕拉却利、M. C. 拉加（Raja）和別人。拉琪亞瑪在一九三三年的大會上是「消除不可觸律」（Untouchables Removal Bills）（即廢除賤民律）主要的勸導人，他全心全力地致力於甘地所領導的「赫列仁」解放運動和「不可觸」的消除。在他總理任內——他在馬德拉斯立法會議提出「入廟律

「(Temple Entry Bill)」、支持着對於正統派頑梗的阻礙的反抗——和此他都以不消有效的努力證明他是印度「不可觸」階級的最好的友人。

在他的生地，鄰近薩勒姆的一個村子，叫做脫律岑哥特 (Tichangode)，拉琪哥帕拉却利創辦了一個小小的農村建設中心叫作「甘地亞西蘭」(Gandhi Ashram)，目的是復興手工紡織與縫紉工藝，教育羣衆消滅不可觸、酗酒等罪行。他至今還擔任着幾種民族組織的重要職位，如「全印禁止聯盟」(The prohibition league of India)的書記，「泰米爾，奈德」省國民大會委員會 (The Tamil Nad Provincial Congress Committee) 的主席，「達克希那，巴拉脫印度」的渣拉却拉克沙巴」(The Dakshina Bharat Hindi Pracharak Sabha) 等的指導員。上文已經提到，他的向服役甚久的國民大會常務委員會辭職這一件事，在全國好似一個晴天霹靂。事實上，他所採取的這一種果敢的步驟，是表示了他的勇於自信和坦率，誰都願意在這前所未有的嚴重關頭，事情不要過於惡化，而國民大會常委會也不致被剝奪他的一個有力領導人。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終於發生了。無疑的在這時際國民大會失去了他是非常可憐的，可是國家還是一樣，因為他還是一個愛國者和政治家，暫時退出了國民大會，他反而能爲國家盡更大的心力。

拉琪哥帕拉却利在他馬德拉斯總理任內(一九三七——三九)顯示了立法行政的很大的才能。

他嘗參與馬德拉斯立法會議而且受一致的推選爲立法會議與國民大會派的領袖。在元三七年，國民大會決定在牠佔多數的省分裏接受組閣使命，馬德拉斯和另外六個省分，組織一個國民大會的內閣，以拉琪亞琪爲總理，所有的國民大會內閣的行政都是相當成功的，馬德拉斯更是如此，因爲拉琪亞琪帕拉却立刻證明他是一個天才的總理——一個無比的議員，一個完美的政治家，一個敏銳的立法者，一個偉大的行政家，他的能力和服務贏得一致的承認，政府人民兩方都是一樣。依爾斯金爵士(Lord Erskine)，那個時候的馬德拉斯總督在好幾次公共集會上用充溢着贊節敬賞的言詞推崇他任行政首長的工作。C. R. 使人纏繞者有多端，主要是在馬德拉斯立法會議裏建議和執行「禁止律」(Prohibition Act)——印度的第一個禁止律。他和他僚屬在行政部門嚴格的經濟措置，無比的公正，和貫徹始終的高度效率，毫沒辜負國民大會的期望。而且即在國內外的辯論者和批評者間，也提高了他們對於這個偉大的民族組織的估計。可是在一兩件事情上，人們和他的意見是紛歧的，這位總理必得應付不少的由於並無多大意義的宣傳所引起的劇烈的反對，他堅信印度的統一和團結帶着一種共同的語言，他是「印弟澄拉却運動」(Hindi Prachar Movement) 指導最力之一人，在總理任內，他規定印弟文爲馬德拉斯學校裏的必修科目，這件事惹起各方猛烈的反對，終於使這件案子不能予以撤消，再有在鄰省說拉梵谷爾(Tirunelveli)

發出制時代的「入廟宣言」(Temple Entry Proclamation)之前，他在立法會議裏勸導了「入廟報」，結果遭受着正統印度教的保守派的攻擊。在上兩事件，反對者用的方法顯然是不甚妥當的，不顧公眾的同情，無情地迫使政府停止那活動。

拉琪哲帕拉却利的反對者說他的政策和理想都是兩破的，矛盾的。有人指摘他是一個獨裁政治家，可又有人說他是個投機分子。他們指出，一九三二年領導「不變節者」繼續與立法會締結交的這位英雄，在一九三七年倡倡成爲組織國民大會內閣執政的馬德拉斯總理，他「曾會領導着國民大會的非暴力運動，猛烈地抨擊着政府以「刑事法補充條例」(Criminal Law Amendment Act)處決政治犯以及用非人道野蠻方法壓迫政治運動的不當，可在執政的時候，對付反對印弟文的煽動以及別種政治犯，就乞靈於上一條例而且用了幾乎相同的辦法，在這裏我們雖然敘述這些事，但並不想藉以判斷其他對他的指摘是否公正。

拉琪哲帕拉却利的偉大不限於政治方面。他賦有很高的文藝天才。他在這一方面的工餘是最有價值的，他是一個熟諳泰米爾文的學者，對英語也有特別的專長。除境不少的泰米爾著作以外——創作和譯作——他也會寫了好多種的英文著述，如「巴加伐脫。吉他」(Bhagavat Gita)和「彼得尼沙特」(Purnishads)的翻譯，關於蘇格拉底，麥克斯·阿爾斯(Marcus Aurelius

的問述，「酒店漫談」(Crats Behind Bars)——一種被監禁時的日記，「禁止方案」(Prohibition Manual) 以及其他，所有他的著作都有一個不易的特點，便是他的堅定的智慧發生驚人的使人激動的力量。

拉琪亞琪是一個有力的天才的演說家，對廣大的聽眾發生迷人的作用。他給人以深刻的印象，特別是能刺戟他所徹底明瞭和同情最深的羣衆的理性與常識。他的自然的幽默，俯拾皆是的機智，運用寓言比喻的說話習慣，他的適時的妙語，奇峯突起的敏對，使他在會堂或廣場裏的演說最有效，最生動。他是印度這一世紀偉大的立法家，他的辯論的特殊能力，他的表達複雜錯綜事件之清晰與具體，和他的善於訴諸理性是他在政治園裏成功的秘訣。

瘦弱，幾乎是憔悴的樣子，體格纖小，穿着純白的式樣簡單的「卡達」(Kadda) (印度手製的布衣) 謙抑的態度，C. R. 的樣子極像一個嚴格的修道士，看他一眼，我們就能相信他是一個瑪哈特瑪。甘地的適合的信徒，不僅在理想和原則，即在外表亦是如此。小而黑的臉，幾乎是沒有表情——除掉談話時發出光輝——加上時常帶着一付黑眼鏡，就顯得格外嚴肅冷靜，他的外貌對他的同胞們都是非常親切的。「赫列仁」(賤民)，高貴階級——他們都崇敬他為領袖，他以個人的犧牲為致力國家的工作樹立楷模。

C·R·可以作一個合適的伙伴，也是一個活潑的講談家，他有敏銳的頭腦，可以洞見事情的情趣。他未嘗是柔弱的，他的態度十分和藹，他從常人近旁遠來，和人相處，毫無尚忌。他的機警是著名^的，在一些情景中，機警的經驗較差的領袖，會感到很大恐懼的，他卻可以控制得宜；他的冷靜的性格，和能^以不同的姿態，使他能控制衝動的羣衆、噪鬧不守秩序的聽眾和受人利用的示威。他還有一樣更有力的武器隨時可以運用於難解紛的，那便是他的由衷的，幾乎是迷人的笑聲！



Н. Н. Ахмедов (1877)

H·H·阿加克汗

(H·H·The Aga Khan)

蘇丹穆罕默德王 (Sir Sulhan Muhammad Shah) 陛下是更容易由他的大名阿加克汗第三而被全世界人士認識的。今天他不只是一個活動場合里的國際重要人物了。慈善家，政治家，教育領導者，回教派的精神領袖，使百萬的民眾服從他，出席日內瓦國聯的總代表，差不多歐洲每一個「巔室」的朋友，一個龐爾拜 (Dahy) 族歷史的創造者，他證明了今天世上沒有一個人能比他更清晰更美滿地運用圓滿生活的最高藝術。

是什麼前提，什麼條件造成了這個人在現代世界史中這種特出的地位呢？

阿加克汗是伊斯蘭先知者連上柯利，他的女婿，與法提馬 (Fatima) 先知者的前妻，克哈達加 (Khadja) 的女兒的直系子孫。他從這點已經使他受到全世界回教徒的崇敬了。再說到他自己，他是回教裏伊斯美里 (Imam) 教派的精神領袖。這種精神的領袖是父子世襲的，而且能指揮成千成萬的宗教信仰徒們，不管他們是在印度、中亞細亞或非洲。這說到因為他是和

蘇(Shah), 法魯馬的兒子的後裔, 他是和一些古時最有名的皇室, 有不可分離的關係的。事實上, 現代史告訴我們說他是波斯王族的一枝。這些就是阿加克汗的宗教與皇室血統的淵源。他的祖父, 阿加胡聖阿里王 (Aga Husain Ali Shah) 是法提阿里王 (Fateh Ali Shah), 波斯統治者的有力支持者, 他和後者的女兒結了婚。王死時, 發生了爭位的糾紛, 阿加胡聖阿里以他當時國內的權威擁立了死者的孫子穆罕默德 (Muhammad) 爲王, 很不幸的就是因爲首領的詭計, 阿加胡聖不得不在一齣對手的軍隊的無效抵抗之後離開鄉土, 那真是一陣暴風吹來的災禍, 而阿加的喪失却好是印度與英國的利益。

阿加從波斯逃出, 取道向阿富汗斯坦 (Afghanistan) 去。正好給那裏的英軍作一臂之助。從那時以後, 在英軍加拉拉巴 (Jalalabad) 之慘敗, 和屈得 (Sard) 地方苦戰的整個時期中, 他對英方都有很大的幫助。

大家知道了他的好意幫助的勞績之後, 他得到居留印度喀喇蚩 (Karechi) 與加爾各答的允許。政府還頒發了一筆年金給他表示對他適時而實際的幫助底感謝。這可不是英印攜手或是他從波斯王朝的放逐的結局。此後一次再次地表示出他是一個巍然不倒的高塔, 不論在印度暴動的危期中, 在印度各處議會天翻地覆的頻仍波瀾裏。

當英皇愛德華七世以威爾斯親王的資格訪印時，很適當的，他接受了這個「戰士皇帝」的稱號。這個「戰士皇帝」曾經受過這個大國的招待，也會證很重地剛答過這種盛意。

就在那個時候阿加克汗第一遷到孟買，在那里養行了亞利伯血族中最高貴的一枝，而且變成了印度王公大臣的密友。

就這樣阿加胡爾阿里年年地進展着，贏得了同儕的青睞與所有人的崇敬。一八八二年，他了結了他豐滿的一生，這一生中，他曾盡了苦與樂，賺得了許多偉大的朋友與尊榮，給自已穿了一件光艷的盛服，在新領的領地上建立了自己地位的根基。

在孟買的黑托其 (Matheran) 的地方的三座陵寢標明了阿加克汗第一的長眠之所，阿加胡爾阿里在波斯王法提阿里的女婿，墨勒提 (Mehru) 與苦姆 (Koon) 兩大省的總督，並與伊斯美里教派精神領袖中間的誠篤的聯繫者。

他的死耗傳到時，波斯王納斯魯丁 (Nasrudin) 立刻致意詢問阿加的儿子阿加利王 (Agha Alyshah)。他同時承認他是回教伊斯美里教派中的新領袖或伊馬 (Imam)，也是波斯蘇丹中的王子。

這新的伊馬是伊斯美里教派的導師底運動工作者。印度各省的 (Jamathnas) 都接納他的

為說把他們自己組織起來。阿加阿利玉是一個博學的學者，一個極的宗教教義的代言人，他的確配掌握住他的感從們底忠貞。

在這時期中，我們應該注意到阿加阿利玉是更親密地和英方當局聯繫着，同時在孟買立法議會中成了大家注視的一員。

他娶了穆罕默德阿里王的姪女，在巴格達作短時之居留。但是懷着遠大的目光他終於回到印度，他自己的工作園地里去。

一八五五年他繼續了他父親統治，儘管短促而可值得紀念的四年之後，很不幸的死亡竟斬斷了他那光輝的工作歷程。他的遺體在極哀榮的一個場面里下葬於回教徒的聖地中的克爾伯拉 (Kor-bela)。

訓練兒子，成為阿加阿里玉的繼承者，使他能担負艱鉅的重担，現在應到阿里妃 (Lady Ali Shah)，那為悲哀所傷損的寡婦的肩上了。他須得是一個接得下這一份鉅大遺產的承襲人，他又必須是英國在印度的權力一個信託得過的聯盟者；他同時還要是皇室的一脈，聖先知的直系後裔，分散在印度成千萬的伊斯蘭里教徒的伊馬 (教主)，在阿里王妃的前面那自然是一件重大的工作。那時阿加汗才八歲。以八歲的弱齡他就被擁立在伊馬的加地 (Gadi) 上。她用她品

格裏的特性的決斷力與那光明正直工作目的來迎接她底任務。她管理着園莊與財產，她自己給孩子優越的教育。阿加克汗學習了波斯，亞刺伯同英國幾種文字。他今日運用英文的貼切可以很明白地證明了這點。他從事鑽研他的宗教哲學與教義，這些是在他未成博學之士之前所必須學習的。這一位開關公子接着學習好多種必要的知識，藝術、科學、哲理、教理、文藝、歷史以及關於憲法知識。

假若說阿里王妃是很有條理的，那麼阿加克汗也就是不相上下地好問而無厭於求知。他在求學時期有極好的表現——急切多疑問，有恆而於工作能自知。所以今天他可以回答你任何方面的問題有如一個專家一樣。沒有一種事情對他格格不入，這是他的特點——他永有求知的狂熱。這是他企求個人以及大眾都能有充滿生活之狂熱的一部分。

當他在更晚一點的時期中，擔任着日內瓦一國聯聯盟一幾個嚴肅的討論會的主席，有一個大政治家說，「他雖是一個人，但獨自佔有了整個國際會上所有的聰明才智。」這好聽不能看得太認真，可是它却說明了這人的品性特性。他不等到準備充分決不輕率妄動，不等到週密地計劃而反復考慮這計劃之後，他決不輕易涉足任何事件。當他經過這些事先預計再開始着手之後，他永不猶豫，更不退讓直到用他堅定意志力與不敗的能力克服了不管多大的困難達成目的而後已。」

簡直是「不可抵敵的力」，至今他還沒有遇見過「不可撼動的阻擋」。

也正是這特點，這天賦詩質總使他事無大小都能應手而決；造成了他「底耶拜」族的勝利，爲那種族創造歷史的成功；使他在全世界的首都里得那麼大的榮名——如在德皇（一九一四年後始遭人譏評）以及在歐洲各皇族與政府裏的榮名，在日內瓦國聯裏的領導地位等。

阿加克汗也能很精細，能屈能伸，正如一個軼事里所告訴我們的，一個 *Parsoo* 青年叫作卡納卡 (*Karaka*)，他曾經先在牛津聯合學院 (*Oxford Union*) 得到詩獎，後來刊行贏得大量印度讀者的著述，一度接近他，還想替他寫傳記，從最好方面說，照後來的情形看來，這不是一件討好的工作；別的顯貴呢，最壞也不過派一個人婉謝了這傳記作者。阿加克汗只回信給他說：「不答應你寫成我的傳記，因爲我沒有想到我一生的工作已經完成了。我還是一樣地謝謝你。」

阿加克汗第一次的訪問歐洲是他的事業的轉機。那裏在聰明多智的政治家，淵博的學者，全世界學識豐富的人們中間，在貴族中間，他是一個無疑地被當作平等的，也是傑出的同儕看待。這真阿加克汗表現了他母親的辛勤精細而自由思想訓練的成績。他早就得到了一個天才，社會各流，慷慨的慈善家，聰明的政治家，愛國者等等的榮譽。

他在英國時被尊稱爲「印度帝國的武帥」(*King of India*)。由於他在孟買大瘟疫中服務勤勞的

緣故，人家才有這樣的認識。對於這位大慈善家，被國人推薦領受諾貝爾和平獎金的，而且後來担任過全世界最大活動之一的日內瓦國聯的主席，這自然不是使他少年成名的唯一慈善工作。

在一八九七年那荒饉了印度的恐怖餓饉中，他親自幫助了一大批人，從事一個大區域的救濟工作。他在卡琪（Cutch）加卡瑟瓦（Kachhwar）普那（Poona）與孟買等處設立救濟所。這也是使他受「印度帝國的武師」稱號的一個原因。

阿加克汗現在是世界馳名的聞人了，這樣一個偉大人物的言語常常給總業以很大的力量。

他表明他雖在歐洲活潑愉快的空氣中並沒有忘記印度——他的第二家鄉。他再三再四地警告國人要他們放棄黨爭，各方團結。他也曾建議一些實際具體的提案來達成這統一的目的。他的主張也同時為印度教徒與回教徒所聽取，可是種族的問題始終糾纏不清着。這問題到現在都不會徹底解決。

在回教的教育圈子裏，他的名字是光榮的。亞里加爾（Allahabad）回教大學是他的慷慨熱誠結晶的永在紀念碑。摩生馬爾莫兒克（Mohsin-ul-Mulk）使他想起這個主意。一口氣阿加克汗捐得三百萬盧比，他自己捐了六千盧比的年金，後來又增到一萬。這個大學相對他也並沒有忘卻了對於他底慷慨的感謝。在一個新近的談話里，這個大學裏的負責人說，「只要這個大學繼

續存在，係開下的高貴的名字永遠爲印度的回教徒用尊敬與愛來記憶着」。

一九〇三年在孟買舉行的「全印回教教育協會」裏，他說，「我們要一個中央大學，在那裏我們的獨立性不致爲機械地效法一個歐洲人而有所損失。另一原因是：我們有一部歷史，在那裏面充滿了高貴的遊俠風格；我們有一個充滿了英雄人物史績的光榮歷史，與那些英雄們的直接接觸聯繫，就能改造我們早年的青年生活，給我們自我犧牲必要的意識，真實獨立的品格，沒有這些，從國家的立場看來，一切教育與知識是無價值的。」

在那兒那回教領袖，愛國者與教育家這樣說過了。

爲了爭取印度政治上的自由前途，阿加克汗在他的熱誠真的愛國狂是不肯後入的。他參加了回桌會議；他著有一本研究憲法問題以及印度進步的發人深省的書，題名印度在轉動期中（*India in Transition*）。他也是些印度最大的民族領袖的學友。

他深得無敵回教徒信心的這一點，是造成他在國內國際地位卓越之一大因素。（有人甚至把他當作一個神的化身來崇拜。這例引起了英國報紙刊物上的喋喋不休的爭論，因爲他們堅持說他的信徒們甚至噴他的鞴面水。）所有的人們願意捐獻給他，他把這些捐款完全花費在社會事業與社會的改進上。

這樣我們就算交代了阿加克汗，一個美滿的人物，一個滲入每個圈子去的人格，一個政治家，演說家，王子，宗教的領袖，可也是一個「底爾拜」族的勝利者，一個社會工作者，總之，他是一個過着最美滿生活的人。



B. R. 安伯德加博士 (1893)

D. R. 安伯德加博士 (Dr. B. R. Ambedkar)

每個愛國的印度人，都感到「不可觸」，排斥了一部份同胞、政治、社會、經濟的權利，僅僅以他的出生於某種社會階層為根據，實在是違反人道和文化的罪行，同時每一個真實的印度教徒都認爲硬把一批人看成「不可觸」是最不人道最不合理的，如果要保持印度教的純潔性，「不可觸」就得滾蛋，許多政治與宗教的領袖已經並且還繼續從事持久不斷的努力來肅清印度教與印度人政治生活上的污點，感謝他們大公無私博愛的努力，認識這種罪惡的不正當與不合理的人，已較二三十年前大大加多了。

不管這無情冷酷的世界是怎樣的安排了無數重的阻礙在他們行程中，那所謂印度的「被壓迫階級」或「赫列仁」(Dalits)依然一次再次地產生幾個傑出與幹練人物，目前在廣大的民衆當中，就有許多領袖。安伯德加博士在許多方面都得算他們中的翹楚，像他那樣的生活歷程，在任何佔有最新社會經濟政治有利地位的人，都要算難能可貴；像他那樣一個沒有一點此類硬

宜的，而有無數的不利必須克復的人，那自然算是鳳毛麟角。他在政治圈裏的拾頭較遲，然而都是稀有的人才，但對那些知道他同他的力量的人，那是不會詭怪的，它反而給我們以更深的印象，證明天地間的公理：真實的美德不管在那個場合總可以找到充分表現與發展的機會，而且不致為社會的陋習或宗教的禁忌所壓抑埋沒，縱然那些惡勢力是根深柢固。

比姆老蘭吉·安伯德加(Bhimrao Ramji Ambedkar)一八九三年生於孟買城中一家貧窮人家。他父親是一個大兵，也是一個「不可觸」的領袖，所以甚至在很早的幼年，安伯德加就知這那「不可觸」的陋習對於他的社會圈裏成千成萬的男女的意義。他生長在對惡勢力抗爭的氣氛裏，這事實伴着他開始社會工作的前後自己的痛苦的，受人輕視的經驗，刺激了他對印度教徒這些高等階級的皮膚。大體說來，像他在「階級」二字之下不知吃盡多少辛苦的人，對於印度教徒高等階級的殘酷苛刻是不足為怪的。

在孟買完成了他的早期教育以後，他到了巴羅達(Ratoda)。他惹人注目的能耐引起格克瓦爾(Gadkari)的注意。一九一二年畢業於孟買大學，得着格克瓦爾的獎學金赴美研究社會學經濟學。他進入哥倫比亞大學(一九一三—一九一六)從那里他得到碩士學位與哲學博士學位。他在英國逗留了一段時間，在印度事務所圖書館從事人類學與經濟學的研究，同時加入格勃(Chhabra)

法學歸。後來又到德國漢堡（Hamb）大學。一些時候後他再到英國進倫敦大學，得了經濟學與商學的科學博士。一九二〇年他應律師考試，於是他成了安伯德加文學碩士、哲學博士、科學博士與律師。可是他回到印度之後，就發覺雖然他在各方面都有了非常的成就，在外國不僅一個大學得了稀有的學位歸來，他因為屬於那一階層，依然只能做卑賤的工作。印度教徒甚至連在他們的住宅裏分賃二間房子給他都不肯。他當時憤恨在宗教與階級雙重壓迫之下所受到的難堪待遇，自從那時起他對二者（宗教，階級）的仇恨就劇烈而不可遏止了。他也曾短時間的執役於已破產的地方政府，可是那些印度教階級的同僚與上司對他的輕視與侮辱，使他終於放棄了那職務。這大大地傷了他的自尊心，在鵝齋無法尋找一個適合於擴展他的能力的地方之後，他回到孟買，鵝光隱隱地決心着手做一個律師。差不多一開始他就成功了，直到今天他在孟買的律師與陪審官的地位有了穩固的基礎。他的銳敏的智力，深入一個案件的癥結，給他一種把握要點的能力。他的分析整理的能力使他成爲一個最善於簡化一個繁複糾紛法律問題於最明晰簡單的地步的巧匠。

安伯德加博士在印度的社會活動中佔了一個重要而有價值的一角，特別在衛護他那一階層的權利這一工作上。他作了一個激進的戰士，現在繼續着他的鬥爭。他對於那些使他這一階級吃苦

受寬的憎恨是永難消除的，同時他對於那些在他面前表示優越態度的窮人，被踐踏了的，被壓迫階級的人們也有同樣的蔑視。他漠視政府和印度教階級對他的側目青眼，因為「照他看來，這些所謂印度教徒並不是爲了真心關心「不可觸」階級編寫這些高深的渺小的政論，實際只是爲了壓洗他們自己的罪名」——（約翰根室——亞洲內幕的作者，譯者）。安伯德加條切地以爲他的這一階級雖有阻礙，但也有自救的力量，他也相信經過一番苦鬥，領導他們到理想境地裏去是他的畢生使命。

他是一九二八年南斯包魯選舉委員會(Southborough Committee for Franchise)和一九二六年印度幣制皇家委員會(Royal Commission on Indian Currency)的監察人之一。「不可觸」階級幹諾聯盟」(註一)的創造人，「不可觸的印度」(註二)的編輯。以被壓迫階級的領袖身分他激發了他們的自覺，主持了多次宣傳會談。他先是倫敦圓桌會議上代表被壓迫階級的一員。後來又是一九三三聯合議會委員會(Joint Parliamentary Committee)中的議員。他和瑪哈特瑪·甘地(Mahatma Gandhi)關於英國政府在同桌會議上的民族宣言有成系統的長篇討論，那時甘地正在伊爾納瓦達(Yerawada)獄中。這就是甘地爲了宣言中被壓迫階級的待遇問題而作歷史性的「絕食至死」的那一回。這絕食繼續了二十一天而瑪哈特瑪的生命也就危在旦夕。正在這

萬分危急的當兒，應顧着世界的輿論與印度的呼籲，安伯德加博士贊成修正民族宣言書的計劃，但並沒有作到他所預計的那麼在立法會議中增多席位。

一個急切向求知者與貪婪的讀者，安伯德加博士，是一個擁有八千餘冊精選圖書的圖書館主。他對他職業的秘傳部份的驚人知識，他把握住最混亂紛歧的經濟與國家財政問題的能耐與他對人稱學究的精湛，都可以說是那些久部門的進步傑作對他的貢獻。安伯德加博士本人，就是許多有名有價值的書籍的光榮作者。他發表的作品最著名的是，「盧比問題」，「英領印度地方財政之進化」，「印度的階級」，「階級的消滅」，與幾個不同題目的小冊子。他是孟買立法會議（Bombay Legislative Council）中的一員，也是獨立勞工聯盟（The Independent Labour League）的發起人。他現在是總督行政會議（Viceroy's Executive Council）中的一員。

安伯德加博士對印度的任何外國統治部激烈反對，他是和任何一個國民大會會員一樣地熱烈爭取著印度的獨立；一極地，他對國民大會和他的政策的憎恨既深且烈。他以為「被壓階級」並不是印度教徒的附屬部分而自有其特別的獨立的不可精神。這意見和甘地熱烈願望想在印度教中改革歸列仁（Harijans）是決不相容的。安伯德加博士是一個流暢的演說家，他的公開講演以發聲對於消滅階級的中心與熱情為特徵。他是具有純潔動機鬥士，這信念使他勇毅地拿起抗爭的

大疑，不畏縮也不妥協地繼續奮鬥。他要消滅印度教中的「階級」與「不可觸」觀念，廢除不自
由的印度。關於這點，每個印度人自會擁護他。

〔註一〕 Bahishkri Hirkarjini Sabha。

〔註二〕 Bahishkri Bharat。



特濟·巴哈德·泊魯爵士 (1875)

特濟·巴哈德·薩泊魯爵士

(Sir Tej Bahadur Sapru)

研究今天新政府政治舞台上的步驟堅定的人物，我們立刻會注意到兩個政治家間諷著的類似，他們都全然由於性格與智慧的力量藉運用合法的方式而獲得了極高的榮譽。

一個約翰·西門爵士，(Sir John Simon) 光輝的學者，成功的律師及在他國內佔有極高地位的人物；勞士便是特濟·巴哈德·薩泊魯爵士，有名的學問家，憲法學的權威，且有「特別」一徹嚴厲的時期——擔任了總督立法會議的法律委員。他們兩人的類似不僅在於他們的事業，而且在於他們對生活及生活中一切問題的態度，在於他們生活中基本的愛憎上，他們中間有切近的心靈的一致，縱然他們活動的範圍差得很遠。

特濟·巴哈德·薩泊魯爵士生於一八七五年十二月六日，經歷過一段光輝的學者生涯，他便從事於律師的私人業務了。他的加入印度國民大會且在大會中佔了很顯要的地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早在一九〇六年他便表露出來一點特性，而那是直到現在還沒有被社會認識的。安諾路斯

Mr. F. Anberly 告訴我們，他曾參加過一次由赫魯士席的集會。在會席上安魯路斯先講得一些長者們說着這樣的話：「我潮不能隱忍地要着你們這般人說一種話而應當說另外一種話。」此後他改說明了在陰謀謀陷於極端的救國與何款的時候，一切事情都趨於何種途徑的進步。薩道爾於說下這般有力的話，他指摘了那些黨於說出這樣以循卑劣的話的人，他的說辭與熱烈的遠說表明他自己總是選舉地說明和反對人。他本不使其停息自他的專權所蔽，對其專制。從此以後，他升稱極高的地位，他曾與總督會議的法律官員，偵察研問官，好幾個大學的副校長。他被政府視為一個極大的愛國者和領袖。他參與了他的伯明翰與奈倫路議會，且可是他和總督並要求着真正的事實與直接簡明的言論。當印度人在南非受歧視和虐待的時候，那是薩道爾直接了當的，綜合說明了印度人在各自自治領事的地位而向英國要着抗爭的。

「同你們一起我們要求在何三帝國內平等的公民資格。我們不願意人家把我劃從自治領的飯堂趕到馬廐去。」這一位對於自己國家，成於侯着應有的尊榮。愛國者說着這樣的話。

就是由於這性格的堅定，愛國的意見，當歐卡蘭·奈·爵士 (Sir Sankaran Nair) 離去的時候他便接受了法律委員的位置。奈爾是在愛國事件發生和壓制的立法穩而公布的時候去職的。那是一個嚴重的時期，人民陷於悲鬱和憤激的情緒之中。任何人都不會去充當一個有名的印度人

剛卸下的職位，可是薩道魯鍾加入政府，他會比單純的不合作做更多的事，總督急切地攔阻他的意見，而他也聰明地提了自己的意見。

現在我們又可注意到他另一個特性了，這特性十分有助於偉傑出的事，並使個成爲印度政治上溫和黨和自由黨的偉大領袖。他最先喜歡憲法同時也最喜歡憲法，他是印度問題的專家，因此他之所以不滿於一切不合法的方式是自然而然的。不論掀起這運動的是怎樣偉大的愛國者。一九二〇年當國民大會在甘地的領導下開始了不合作運動的時候，薩道魯便脫離了大會。

對於甘地個人，他抱着很大的崇敬，而對於他的政策，他却有着批判的與理性上的不滿。他們有同一的行動目標，那就是印度自由，不過甘地走得更遠一點，而聲言「如果可能，就在帝國內求得自由；如果必要，就脫離帝國。」薩道魯是屬於阿克哈爾所領導那一思想派別的，這派別相信是上帝與不列顛和印度連合在一起。

後來，他對於政府政策更抱批評的態度，並且藉着他同依加亞卡（*W. C. Aggarwal*）的贊賞，他幾次地促成了政府與國民大會的政治休戰，薩道魯是印度那一複雜的知識份子之羣的一個高貴份子，這一羣人組成了印度的自由黨，他們都是很好地服務於國家，收到了豐富的賞賜，整得了官位與聲望的人，他們總走着有秩序地緩進合法的道路。

他們對於國民大會煽動直接行動的結果多少抱懷疑的態度，可是，我們又必須承認，他們整個團體却也和絕望的與飢餓的農民並不接近，這些農民們要求急速的解救，但是太重幻想，不相信自已可以改變多少世紀來壓倒了他們的制度。

因此在羣衆中他們沒有廣大的信徒，可是他們的工作却是和那更壯觀而迅速的國大的方式在國家的成長上同等重要。

薩道齊在個人生活中是個可立的有修養的人物，他的足跡很廣，他的了解歐洲正像我們了解我們的後園一樣。他是一個有修養的世界公民，常識豐富，聲譽卓著，從政府和人民得到了無限的尊榮。

西門委員會 (Simon Commission) 在他一生事業中是個轉捩點，他服務於印度名人的委員會前面。這委員會後來被派定去支持印度人民的願望並抗議純粹白人委員會 (All White Commission) 的組織，他參加了國庫會議，會中他提出了自己的計劃與建議，堅強地爲他們的被接受而奮鬥，但是最後却是失敗了的，因爲那不是治者與被治者共議共組的政府的計劃，而是強置於屬民之上的。

現在他在阿拉哈巴德 (Allahabad)，又回到他舊有法律業務中去了，可是我們也很可相信

他的主要愉快還在於研討憲法和憲法問題。

今天的時代又充滿了危機。薩泊魯爵士可能再被請出來，對於國家的命運盡決定性的作用——作爲和平使者或作爲一切錯誤政策的坦率的批評者，不管這錯誤是民族領袖的或是政府的。

我們願意統計一下他所得的一切榮譽來結束這短短的對於他人格的描述。這一位學者、律師、社會改良家、合法的自由黨進步份子與領袖——，這黨有一個時期會是印度政治中最前進最有力的團體。

薩泊魯爵士，這位碩士、法律博士、民法博士、文學博士、「印度武師」(K.C.S.I.) 樞密顧問官，證明了印度人在任何工作或官職上都能與他人平等，表現其優點與成功。

他的經歷有如下開：

- 一九一三——一九一六年聯合省立法會議員。
- 一九一六——一九二〇年帝國立法會議員。
- 一九〇六——一九二七年全印大會委員會委員。
- 一九一三年聯合省社會會議員。
- 一九一九年聯合省政治會議員。

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聯合省自由聯盟會員。

一九一九——一九二三年總督行政院法律委員。

一九二三年帝國會議（倫敦）會員。

一九三〇——一九三二年阿東會議會員。

一九三三年國議會聯席委員會委員。

一九〇四——一九一七年阿拉哈巴德法律雜誌總編輯。

一九一〇——一九三〇年阿拉哈巴德大學榮譽研究員，貝奈米斯印度大學會議評議會理事會

會員。



班底特·馬丹·魯罕·莫拉維亞 (1862.)

班底特·馬丹·穆罕·莫拉維亞

(Pundit Madan Mohan Malaviya)

「勤力的」，這是形容班底特·馬丹·穆罕·莫拉維亞的最恰當的字。他是一個愛國者，政治家、學者、思想家，教育家與宗教領袖的聯合體，他有着甘地般的思想的遠見和理想的高貴；尼赫魯般的愛國熱忱，和領袖才能；阿沙德般的學問和道德。他與很多今天的印度民族領袖有類似之處，可是，雖然如此，莫拉維亞却屬於他自己獨特的階層。他是一個正統的印度教徒，同時是印度教正教信奉的一個堅實的無畏的擁護者。由於他信奉印度教的極端性，他乃與其他任何印度的第一流政治家都顯然有別。爲了滿足他的宗教信念，他準備作任何犧牲，並服任何奇怪的困難。許多時候，爲履踐他的宗教儀式而達到的地步會使一個信仰較低的人發笑的，可是莫拉維亞充分地相信印度教的純潔和力量，不是唯一地也是主要地，存在於對古代宗教信條與牠們所規定的謹嚴儀式的內心的服從和執行。於是他便成爲當代印度最偉大的「聖納坦」派 (Sanatan) 的領袖，保持着吠陀經典時代的古代印度教的絕對的純淨。在這同時，他又成爲印度政治自由

的珍貴有力的支持者。這就是說，在他內心存在着永恆的不可遏抑的宗教與政治的衝突。這兩者在甘地是澈底協調的，因為甘地已經全然精神化了政治，因此對於想政治和宗教界很難分別的，對於尼赫魯，在這兩者中間是沒有衝突的，因為他放棄了一個而為另一個清除道路。可是莫拉維亞却必須分他的忠心給這兩者，因為在他，印度正教信奉和印度民族主義是同等寶貴，同等重要的。

莫拉維亞的家族和尼赫魯的家族一樣，屬於克什米爾班底特 (Kashmir Pandits) 一族，他們在多少世紀前因回教徒的入侵出走的定居於印度的聯合省，這個包括幾千人的宗族，在前一世紀曾產生了很多有能力的對公共生活有影響的傑出人物。同時，作為一個宗族，它又因其成員的睿智、學識、義勇、和精神，而負有盛名，見解的獨立，精神的剛強，目標的執着與崇高的原則，這些，莫拉維亞和這宗族中其他著稱的領袖共有的。貝諾拉斯印度大學 (The Benares Hindu University) 是這位偉人的巨大成就與他不墜的熱情和持久的努力的紀念碑，他單獨地就可給他在其他印度最偉大的建國者中間建立地位。印度教古文化的保存，印度教古學術的散布，印度教古教義的宣傳，這些都是與他最為切近並最為他鍾愛的事業，他想法完成它們而在貝諾拉斯 (Benares) 設立了這第一流的大學。貝諾拉斯是古印度光明與學術的中心，是遠古以來印度教徒的朝拜的聖地，因為有名的維斯瓦納斯納 (Vishvanatha) 就生這地。

一八六二年莫拉維亞生在一個正統印度教的家庭裏，他的早年經歷了道德與智慧的訓練。莫拉維亞家族是顯赫的，它負有幾代的學術上的名譽，有些是以他們正教信奉和保守觀念著稱，因此年青的莫拉維亞很快就急於研究和求知，尤其是宗教性質的知識。這是不足為奇的，他特別熱心於梵文的研究，這爲他啓示了印度古代學術未經探求區域的新的遠景。他特別喜歡古代聖者與「里西斯」(Rishis)(註一)的著作，這是哲學與神學的無盡的礦源。他提示印度青年以研究梵文的重要，就祇這學問便可給他們以印度寶貴的民族遺產之直接的知識。越研究越思索古代宗教的與世俗的著作，他越感到在原始的純粹與純潔中保持印度教義的重要。他不僅是一個偉大的學者，而且在把握與解說深奧難解的宗教或形而上學的問題時，他有着善於思維的心性，敏銳的睿智，清禁的邏輯與執中的判斷能力。他有着各式各樣古代近代的高深知識。在這些中間，有些他的博學是無比的，另外一些，他的博學也是可重視的。

莫拉維亞的正教信奉和對於印度的「純淨」的執着並未阻止他去和其他印度領袖攜手反對「不可觸」觀念，因爲這觀念，如它被人了解與實行的，在任何印度教義中都沒有絕對的規定，所以在他嚴格的宗教信仰與這急進主義表面的歧異是不難解釋的。這個可悲的習俗在早期梵文時代人們是不曉得的，所以我們很可推想它的產生祇是由於局部或外來的條件與影響。可是確有些

事情，爲了他們，莫拉維亞是可以與全世界作戰的。他強烈地反對國家對於特別社團的宗教儀式或習俗的干涉；例如，當中央立法會討論關於某些印度教區「童婚」這一習俗的法案時，作爲議會一員的莫拉維亞便猛烈地攻擊並以對政府採取對於這件事的立法程序。在這個題目上，他同其他的班底特人（Pandits）和印度教的領袖保持同一觀點，就是在印度教義中，早婚不但是允許的而且有些場合是強迫的，於是任何聲稱這種婚姻爲違法的立法方案，他都視爲宗教迫害，或至少是宗教干涉——那一個政府都要避免。

爲了印度教歷代聖者和教師們所開發的一切真理，莫拉維亞不願近代無教宗教中不馴的傾向，挺身出而支持。他不是一個盲目的信徒，也不是無理性的狂熱者。他最後在前人那裏接受的，認爲對宗教，社會，或其他人類組織有益的東西，都會最先受到他的理智與常識的考驗。他對印度教過去光榮的虔敬和他的正教信奉都並不與他強烈地愛國主義或服務國家的熾熱的期望相衝突，下面一件事實就是這話的證明。當國家要他和其他印度人民領袖同去倫敦參加國桌會議的時候，他毫不遲疑地答應了這要求，不願他家族積久推崇的一些習俗，和傳統心理上壓抑了很多宗教規定，採用了一些，捨棄了一些，他參與了這集會，而爲了出國的需要，他是忍受了許多難言的食物與物質享受諸方面的困難，對於這種光榮的勇敢，他的國人寄以極高的讚譽。

一九二〇年廿地所掀起爲其他著名的領袖們所三神支持的不合作和平不服從運動，除了莫拉維亞一個難得，在一個很長的期間內，他不能使自己完全同意國民大會的方式，而他也從不掩飾自己的觀望。整個的國民大會期中，他都勇敢而率直地反對大多數領袖們的決定，但是不管同意他的意見與否，國大的一切部分都以極大的尊重聽取他的言辭，因爲他的武藝和勇氣是不容置疑的，所以雖然他未能說服對方，使之相信其路線的不對，而他却仍接受着他們的敬重。所有這時期，他都拒絕離開大會，因爲他對這樣的一個民族組織是有絕對的忠心的，過了一些時候，他漸漸認識了國民大會所規定的消極和平抵抗政策和某些政治罪行鬥爭的效果。當時時候到來，他也真的要求緊縮，而僅僅地同其他的許多偉大領袖一同走進監獄。一九三〇年不服從運動傳播全印，政府施行了嚴厲的壓迫政策，在孟買門街上，警察封閉了道路，許多國大領袖和國大常務委員會委員便在大街上蹲了一夜，而莫拉維亞便是其中的一個。這是國民大會公開違抗壓迫那一次。隨後的九年中，政府逮捕了他好幾次，他被判下獄。爲了救國的緣故，他也都是甘心接受這判決的。

習慣簡單，生性平靜，班底特·莫拉維亞幾乎是一個穩迦主義者。（註二）在他身上身心智慧與靈魂都有着諧和的發展。在可敬的高齡之外，他的文雅優美的貴族容貌和他平靜的表情，都給

他一個熟人的外表，雖然他年齡很大，而他仍保持着對於事物的青年人的興趣，且是一個活潑的人的伴侶。他天賦極強的記憶力，同時他精神的不倦不息也是十分平凡的。據說在僧獄中生活的末期，他曾企圖學習德文，也獲得了可觀的成績。他曾由印度富有的王公和別的富人處募得了多少萬盧比來建設貝諾拉斯印度大學。由這件事情上我們可看出他崇高的人望與全民族對他的重視和信心。最近（一九三九年）他作了一個「吐納」(Breath-Taking)的奇蹟，在喜馬拉亞山來的相傳有一百七十五歲的一個老瑜伽主義者，監視與指導之下，他實行一種叫做「卡亞卡路巴」(Kaya Kalpa)的治療，這種治療據說可以有還童保健的無限的力量。在二十天的這樣神奇的治療之後，就是說在閉居於一個不通風的沒有光線的特室吃過一些特別的草食與藥物之後，莫拉維亞出來了，「還童了」，他說二十天中他感覺已年青了廿歲。

註：一、奧西斯 (Osiris) 是古印度的一些羅漢的聖者。他們由於信仰思維與研究而獲得了超自然的力氣，古印度的大部著作都是爲此輩而寫。

瑜伽主義者 (Yogi) 由於苦行與自律而獲得了偉大的精神力量的人。

後記

本書 (Indian Leaders of Today) 是加拿大的教育出版社 (The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mpany) 刊行的，一九四二年十月出版，取材應該不算陳舊，敘論觀點也還平實。內中甘地，尼赫魯，阿沙德，真納，阿加克汗，安伯德加六人是李俊濟兄譯的，薩泊魯，莫拉維亞二人是李曉兄譯的，我翻譯了奈都夫人，拉琪哥帕拉却利二節。我們文字的造詣均極有限，加上了手邊沒有什麼書可以翻檢參考，舛誤之處必多，如蒙識者指正，那實在不勝感禱！

紀孟 卅二，十二，廿六，校畢

印羅十大民族領袖

譯者 李俊濤

李驥

孫超孟

發行者 進修出版教育社

昆明福照街二〇四號

桂林中南路斗姆巷十一號

經售者 各大書店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四月初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20

ATY 050

4.11

8300